

避免衝突、交叉壓力與政治不活動

邱師儀*

摘要

西方關於交叉壓力導致「政治不參與」的研究頗多，近年來國內以美國模型為依據，引進交叉壓力論述並進行經驗測試的研究也有一些，本文整合中外有關交叉壓力的假設進行經驗檢證。本文統稱不參與各種政治活動的行為為「政治不活動」。問題意識為：是否交叉壓力導致政治不活動？是否特定的政治參與種類特別容易受到交叉壓力的影響？是否由「社會學派」衍生而出的交叉壓力，也存在「社會心理學派」衍生而出的對照變項：「避免衝突」呢？是否避免衝突也導致政治不活動呢？與不同對象，如家人、朋友、鄰居與同事，因政治立場不同所產生的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在導致

* Shihyi Albert Chiu

服務單位：東海大學政治系

職稱：專任助理教授

主要學經歷：美國 University of Nebraska at Lincoln 政治學博士，亦曾任該校兼任講師

專長學科及目前研究領域：政治參與、政治心理學、研究方法

電子郵件：albert12357@gmail.com

個人網頁網址：<http://web.thu.edu.tw/albert6811/www/>

政治不活動的結果上有何不同？本文運用「臺灣民主與選舉化調查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資料」(獨立樣本)，發現與家人、朋友產生的交叉壓力，會抑制投票行為，也會延遲投票時間。但是與同事、鄰居產生的交叉壓力，反而驅動投票與拉票行為，也縮短決定投票意向的時間，顯見與同事的歧異性刺激投票行為。再者，避免衝突的變項預測政治不活動的能力有限，但配合「與鄰居有不同政治立場」時，避免衝突的程度越高，在選舉中拉票的機率越低。最後，本文進行兩階段最小平方法，檢證交叉壓力、避免衝突與政治參與之間的因果關係。

關鍵詞：交叉壓力、避免衝突、政治參與、政治社會化

壹、前言

政治參與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沒有民眾在政治系統輸入他們的支持與反對，政府容易獨裁（Tocqueville, 1830），但有很多因素阻礙民眾的政治參與，從密西根學派的觀點來看，心理因素與政黨認同預測投票行為與廣泛的政治參與（Campbell, Angus, Philip Converse, Warren Miller and Donald Stokers, 1960; Fiorina, 1981; Bartels, 2000），若選民心中對政治參與缺乏興趣，或者對政治感到反感，則不會選擇參與。

從更早期、興起於 1940 年代的哥倫比亞大學學派（以下簡稱為哥大學派）來看，個人所身處的政治脈絡驅動人們去參與政治（Lazarsfeld, Berelson, and Gaudet, 1968; Agnew, 1994; Carmines and Huckfeldt, 1996），哥大學派從社會學出發，主張周遭環境激勵政治參與，同理，周遭環境也有可能抑制政治參與，尤其當家人、朋友、鄰居與同事與個人政治立場歧異時，彼此之間所產生的衝突，導致個人延遲投票決定（Lazarsfeld, Berelson, and Gaudet, 1944: 60）；避免衝突的心態也使人不去參與抗議、競選造勢，與政治討論（Ulbig and Funk, 1999: 275）。廣泛來說，一般民眾對於充滿衝突的政治議題，顯得立場搖擺（Mutz, 2002）、態度冷漠以及興趣缺缺（Hovland et al., 1953: 283）。也有研究發現，居民間充滿歧異政治意見的社區，比起居民分享均質性政治意見的社區，有較低的社區事務參與率（Alesina and Laferrara, 2000; Campbell, 2004; Costa and Kahn, 2003）

人際之間對於政治意見與立場的歧異與紛雜程度，或者個人身處一個周遭政治立場與政治意見不一致的環境，對於這種情形，西方學界稱之為「交叉壓力」(cross-cutting pressure)或者「交叉網絡」(cross-cutting network)(Simmel, 1955; Popkin, 1965; Hope, 1975; Horan, 1971; Jackson and Curtis, 1972; Davis, 1982; Knoke, 1990; Mutz, 2002a, 2002b)，國內學界也有人稱其為「人際網絡異質性」(network heterogeneity)(Liu and Chiu, 2011)。吳重禮、鄭文智和崔曉倩(2006: 600)具體描述交叉網絡的特性：個體與所處團體構成一張社會網絡，當此個體處於這個「矛盾、對立、衝突的社會網絡之下」，個體傾向不參與政治，這種不參與，源於個體顧慮自己政治立場太突兀，為避免衝突、顧慮群體和諧而選擇不參與。值得說明的是，哥大學派就選民所屬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來探究該脈絡對於選民政治參與行為的影響；而後續的學者如Mutz(2002)從此社會脈絡的概念出發，更細緻而具體的談論到社會脈絡中，個別選民因為與身旁家人、同事或者朋友之間因意識形態或者政黨支持不同而感受到的人際壓力，這種人際壓力的存在，不僅在廣泛的社會脈絡當中；進一步來說，更是社會脈絡中因為人際間不同政治立場而產生磨擦與不合的一種「人際網絡」型態(social network)，呈現交叉壓力的現象。簡言之，人際網絡指社會脈絡中的人際互動；交叉壓力又是眾多人際網絡種類當中的一種¹，其特徵為人際間政治立場的歧異性²。

其次，「避免衝突」與「交叉壓力」兩個觀念緊密相關，前者

¹ 也可能有和諧的人際網絡型態。

² 感謝其中一位審稿人督促釐清「社會脈絡」與「人際網絡」在概念上應如何連結的問題。

代表社會心理學的密西根學派論述；後者代表社會學的哥大學派論述³，避免衝突代表個體內心的、主觀的一種認知與傾向；交叉壓力則代表個體周圍的、客觀的一種政治立場紛雜的狀態，兩者理論上都與政治參與成反比關係。關於民眾選擇「不去」參與政治的行為，本文以「政治不活動」(political inactivity)統稱之，此一辭彙由 Verba 等人在討論民眾不去參與政治活動時所提出 (Verba, Schlozman and Brady, 1995: 127)。

本文運用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or TEDS) 2008 年立委選舉資料⁴，接續政治參與文獻中，很重要卻不易產生一致性發現 (Verba, Schlozman and Brady, 1995: 127) 的研究面向：導致公民政治不活動的因素有哪些？經文獻探討，筆者假設公民因害怕衝突、追求和諧而選擇政治不活動，然而有些研究者無法釐清哪些政治參與種類，因為有衝突本質而不受公民青睞 (Kenny, 1992; Leighley, 1990; Mutz, 2002)？因此筆者進一步釐清各種政治參與活動是否具有衝突本質，與政治不活動之間的關係為何？一連串的研究問題有：為什麼有些公民選

³ 詮釋政治參與的另一大學派為理性抉擇模式，由於不在本文重點，因此不予討論，相關文獻請見 Key, V.O Jr. 1964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Knopf.; Downs, Anthony, 1957,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Rational Abstention" Ch14 of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⁴ 本文使用的資料全部係採自「2005 年至 2008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 (III)：民國 97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計畫案」(TEDS2008L) (NSC 96-2420-H-002-025)。「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 多年期計畫總召集人為國立政治大學黃紀教授，TEDS2008L 為針對 2008 年立委選舉執行之年度計畫，計畫主持人為朱雲漢教授；詳細資料請參閱 TEDS 網頁：<http://www.tedsnet.org>。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擇不去參與政治？公民最容易「放棄」參與哪一些類型的政治活動？害怕政治參與過程中所產生的「人際衝突」，是不是容易使人放棄參與？是不是所有政治活動都富含這種使人遠離的衝突元素？

貳、國外文獻

國外文獻探究的部分，主要聚焦在回答三個問題：第一、交叉壓力抑制政治參與的效果是否真的存在？第二、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在概念上的分野為何？第三、避免衝突抑制政治參與的過程為何？

關於第一個問題，以哥大學派出發，主張交叉壓力抑制選民政治參與的研究，在 1960 與 1970 年代僅找到有限的佐證資料，例如 Pool, Abelson 與 Popkin (1965) 研究 1960 年的總統大選，無法得出「交叉壓力抑制投票」的結論，然而，這些早期研究發現交叉壓力極有限的影響力，可能是因為都把選民在特定社會類別中的成員身分（譬如基督教徒、中產階級），當作是身處交叉網絡的狀態了（類似批評請見 Horan, 1971; Mutz, 2002）。1970 年代關於交叉壓力的研究仍然困頓，甚至有研究發現「交叉壓力導致政治參與」的相反發現（Knoke, 1990，有詳盡的文獻回顧），不過有可能是因為當時判定「是否有交叉壓力的存在」，係由研究者以受訪者所屬的社會類別（例如勞工、上班族等）為依據，來認定是否受到同儕間交叉壓力的影響？恐怕流於主觀（見 Mutz 批評 2002: 839）。

近幾年，全國性的民調問題已納進由受訪者自己列舉是否感受到交叉壓力的「直接測量」，於是一些研究陸續發現交叉壓力的存

在的確與政治參與成反比 (Ulbig and Funk, 1999; Mutz, 2002)，然而研究者更關心哪一些特定的政治參與活動，特別容易受到交叉網絡的影響。這與該政治參與活動是否涉及人際互動？是否引起歧異意見 (opinion disagreement) 等因素息息相關，這些因素容易造成衝突，使意圖參與者最後退避三舍。

Huckfeldt (1979) 與 Giles、Dantico (1982) 發現參與者的社會脈絡 (social context)，會影響具社會互動性質的政治參與 (例如助選造勢和與人合作向政府請願)，這是因為社會脈絡提供參與者參與的依循路徑，所以能導引民眾去涉入人際互動性質的政治參與。但若政治參與由單獨個體為之，例如投票、捐款給候選人，則個體從事這些活動時，不受社會脈絡中隱含「應該怎樣參與」的暗示影響 (Zipp and Smith, 1979)，據此，Leighley (1990: 467) 運用 1970 與 1976 年的美國國家選舉調查研究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再次檢證這種社會互動 vs. 個人單獨為之的政治參與的分野，意外發現政治討論者彼此之間的政治衝突 (conflict)，反而導致投票行為、接觸政治人物，與替候選人助選，統計關聯性的方向不但與一般預測交叉壓力的方向相反，Leighley 的研究也沒有找到社會互動性政治參與 vs. 個人性政治參與，與交叉壓力之間的特定關係。

一、交叉壓力抑制政治參與效果的再發現

Ulbig 與 Funk (1999: 269) 重新整理社會互動 vs. 個人單獨政治參與之分類，將政治參與分類為公共的 (多衝突) 對上私人的 (少衝突)；特殊利益的 (particularistic, 少衝突) 對上更廣泛的 (far-reaching, 多衝突) 的參與，這裡分類的核心元素其實就是「衝突」，「抗議」的

衝突性最強，「助選」與「討論政治」居中，「投票」由於其秘密投票性質最不具衝突性，與「接觸官員」同樣具有溫和的性質。結果發現 (Ulbig & Funk, 1999: 275) 越傾向避免衝突的人，越不會參與抗議、參加助選與討論政治；而投票與接觸官員則在統計上與避免衝突沒有任何關聯性，與交叉網絡只與「社會互動性的政治參與」產生關聯性的預計相符合。值得注意的是，Ulbig 與 Funk 對於避免衝突的測量，只由一個題目構成：其中一端是「受訪者避免進行政治討論，因為政治討論的經驗可能使受訪者感到不愉快」，另一端則是「即使有可能導致言詞上的針鋒相對，受訪者仍舊喜歡討論政治」，這樣的測量，與受訪者感受到⁵與旁人政治立場不一致之「交叉網絡」的測量（社會學、外在環境式的）不同，反而比較接近密西根學派社會心理學式的測量，也就是受訪者內在地、主觀地認為應該避免人際衝突的想法。

就第二個問題而言，Mutz (2002) 認為不只外在人際網絡政治意見的不一致，就連內在個體避免衝突傾向的元素，都能預測「政治不活動」。對 Mutz 來說，交叉網絡或者交叉壓力指外在環境當中，個體與身旁的人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產生的人際壓力；但是避免衝突是指個體內心中預防或者遠離可能發生人際間因政治立場不同而產生的衝突。

⁵ 儘管受訪者感受到與旁人政治立場不同，不必然反應彼此之間實際的政治歧異，但國內外的民調多是用「受訪者自己來評估」進行測量；此外，受訪者自己評估所產生的認知，終究是會不會阻礙政治參與的關鍵因素。換言之，假設一個受訪者「實際上」與旁人的政治立場完全一致，但只要這位受訪者感受到自己與旁人不同，不管是怎樣的原因造成這樣的落差，仍舊是社會脈絡給這位受訪者最終的衝擊與印象，進而影響其是否參與政治的決定。因此由受訪者自己來評估是否身處交叉壓力中，有其測量上的基礎。

此外，Mutz 在理論層次建構兩個與社會心理學緊密相關的架構，第一個是「政治兩難」(political ambivalence)，指若個體身處在無法與自己政治意見相符合的環境中，這時候個體內心產生掙扎，原本的政治傾向開始動搖，也變得不確定，政治兩難與「缺乏政治態度」是不同的（見 Alvarez & Brehm 1995, 1997），前者是政治意見的立場受到干擾，後者是原本就沒有想法。個體面臨內心政治兩難的情形下，參與政治的可能性自然降低。

第二種是社會責任說 (social accountability)，社會責任說的核心概念為和諧觀，當個體面臨到紛雜政治意見時，社會責任不是讓個體難以決定採取誰的立場？而是採用任一方的立場，恐怕會對另一方無法交代，難免破壞「社會和諧」(social harmony, Mutz, 2002: 840)，所以 Mutz 用「避免衝突」(conflict avoidance) 來測量這種顧及社會和諧的個體傾向。

在模型建構階段，Mutz 同時納入交叉網絡⁶，與兩個社會心理學變項「政治兩難」與「避免衝突」，結果發現「交叉網絡」與「政治兩難」與「單獨進行性質」的投票產生統計上的關聯性，身處交叉網絡與具有政治兩難傾向的受訪者，在 1992 年總統大選中傾向投票棄權，同時也延遲投票決定。「政治兩難」與「避免衝突」同時還詮釋受訪者不參與衝突性強的種類如抗議。

也就是說 Huckfeldt (1979) 與 Giles 和 Dantico (1982) 對於政治參與種類的分野，在 Mutz 的研究中並未被支持，交叉網絡與政治兩難不但詮釋衝突性的政治參與，也詮釋不具衝突性質的政治參與（例如投票與接觸官員），可能的原因為：縱然有些政治參與種

⁶ Mutz 稱產生交叉壓力 (cross-cutting exposure) 的地方就是交叉網絡 (cross-cutting networks)，請見頁 840 與頁 842

類，看似在非社會互動情形下進行，但是所有的政治參與都由社會建構，因此仍然被人際網絡與政治兩難所詮釋（Mutz, 2002: 849; Kenny, 1992）。重要的是，在 Mutz 的模型中，當「交叉網絡」、「政治兩難」與「避免衝突」詮釋 1996 年總統大選中的投票行為，個別交叉網絡與避免衝突變項並未顯著，但這兩個變項的交互變項呈現負的顯著，換言之，「避免衝突」本身不會抑制投票決定，只有在配合「交叉網絡」時才會抑制投票，這個統計發現正好回答到第三個問題，也就是避免衝突「如何」產生抑制政治活動的效果？也意味著政治參與行為，不見的無時無刻都觸動個體心中那個害怕破壞和諧的按鈕，只有實際身處四面意見不一致時，避免衝突才顯現詮釋政治不活動的一面。至此，從 1970 年代至 Mutz 西元 2000 年後的研究，對於避免衝突與交叉網絡是不是只對互動性強的政治參與有所影響？尚未有定論，本文遂有運用臺灣資料來測試這兩種說法的動機。

如果說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在理論上造成政治不參與，反證即為「均質的言論環境」或者「擁有均質的經濟社會地位的團體」應該造成「政治參與」，如此正向連結的文獻很多，例如，高經社地位的個體（Huckfeldt, 1979）住在高經社地位的社區，會比高經社地位的個體住在低經社地位的社區，來得容易參與各種政治活動。又例如較為均質性（政治立場一致）的政治討論，會比較為異質性的政治討論，更能激發政治參與（Leighley 1990, 460）。也就是說，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抑制政治參與是一體兩面的論述：均質的言論環境或者不畏懼衝突場面時，個體參與政治的程度即會提高。

最後，一個理解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導致政治不參與的可能視角，是政治活動充滿了衝突與對立，例如美國民眾對於政治的反感

與缺乏興趣，來自於政治過程中充滿了嘈雜之聲（Hibbing and Theiss-Morse, 1995, 2002），特別是美國國會冗長、充滿對立、缺乏效率的立法過程，因此民眾對於政治過程中富含的衝突元素，不但促使民眾不信任政府，也使得民眾遠離政治參與（Ulbig and Funk, 1999，引用 Hibbing and Theiss-Morse 在 1995 年的研究，解釋避免衝突與政治不活動的關聯性）。

但 Hibbing and Theiss-Morse（2005: 227）認為，充滿衝突的政治過程本身沒有錯，好的公民需要認清政治總是在對立與折衝中擺盪，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在 *Stealth Democracy* 一書（2002: 182）中，Hibbing and Theiss-Morse 認為一般公民參與社會團體與進行審議式參與⁷，「不見得」能增進集體決策品質（如投票結果）、增加政治治理系統的正當性，與增強公民參與者的素質。為什麼一般民眾進行審議式的政治參與不見得管用？第一、如前所述，民眾不喜歡政治參與混亂與衝突的本質，自然不願進一步審議。第二、鼓勵廣泛的社會與政治參與僅是物以類聚，參與過程中個體會往同質性，而非異質性政治立場的人去結社（也見 Berscheid and Reis, 1998; Byrne, 1997; Newcomb, 1961; Boyden et al., 1984; Burlison and Samter, 1996），反而造成社會隔閡甚至對立（Hibbing and Theiss-Morse, 2005: 233）。這一系列的研究總結民眾不喜歡政治參與是因為其有衝突的本質，若強迫大量的草根參與則對民主政治的發展不見得有利。

⁷ Hibbing 與 Theiss-Morse 在該書第七章中，深入討論「一般民眾」進行審議式民主是否產生優點的迷思？審議式民主在他們的書中，並不專指政治菁英間的政治活動，而是一般民眾也可以進行的一種政治參與模式（deliberation among ordinary people, 該書第 172 頁），只是比起期望一般民眾投入審議的行列，Hibbing 與 Theiss-Morse 更推崇代議式民主的運行（見該書第 216 至 221 頁）。

二、倒因為果的可能性

不管是交叉壓力，或者是避免衝突都指涉一個使人不去參與政治的原因：社會和諧。因為個體害怕破壞社會和諧，或者為維持社會和諧，因而導致個體不去政治參與（Rosenberg, 1954~1955; Mansbridge, 1980），Conover 與 Searing（1988）發現民眾深知政治討論的過程中可能會破壞人際和諧；Ulbig 與 Funk（1999）發現具有避免衝突傾向的個體，傾向不去參與某些類型的政治參與。

然而，這裡有一個因果方向性的疑慮：到底是先避免衝突，才導致不參與政治，或者因為長期避免政治參與，而產生喜歡和諧的人際關係？針對這個質疑，Mutz（2002: 845）指出，長期「不去投票」或者「很晚做出投票給誰的決定」（也就是避免政治參與），並不會讓個體身處與旁人政治意見和諧融洽的環境中，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

至於另一個焦點元素「交叉壓力」，與政治不活動的因果關係方向性是否有問題？則疑慮不大，筆者認為，說「個體因為不去政治參與，因而身處與周遭人政治意見一致的環境中」，聽起來是反直覺的（counterintuitive），邏輯上是先有交叉壓力，才有政治不活動。對於政治不參與是否「導致」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的問題？或者說，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是否為政治不參與的「外生變項」（exogenous variable）而非「內生變項」（endogenous variable）？檢證上頗為棘手，但也不是沒有具說服力的嘗試。Mutz（2002: 118）在一篇處理「交叉壓力」導致「政治寬容」的研究中，運用兩階段最小平方法（Two-stage Least Square or 2SLS），發現「接觸相同或

不同政治意見」，是「傾聽同伴歧異政治意見」與「理解反對聲音的存在」的外生變項；繼而「傾聽同伴歧異政治意見」與「理解反對聲音的存在」是「政治容忍」的內生變項。換言之，交叉壓力本身有一些內部元素，在 2SLS 解析後先導致交叉壓力，再導致政治寬容，顯現因果順序性。

但是合乎標準的外生變項 (instrumental variables or IV)，需直接與內生變項相關，但與誤差項 (error) 不相關的前提下才能進行 (Bollen, 2001)，或者至少要有可以執行的相關題目。因此仍然不若實驗法來得直接，據此，Mutz 在同一篇文章中 (2002: 120)，運用 82 個學生分配在三組中進行實驗，確認了交叉壓力導致政治寬容的因果關係。實驗法的弱點，是實驗結果無法像大規模隨機抽樣來得有母體代表性，但是實驗法因果關係明確。本文受限於研究資源，無法運用實驗法，但仍會在經驗檢證中，以 2SLS 來測試是否交叉壓力由某些外生變項所導致，進而才促成政治不活動（這是對立假設）？如果經由比對模型的 Hausman 測試，若發現 2SLS 模型並沒有比 OLS 模型更具模型詮釋力的話（這是虛無假設），初步建議了 OLS 模型中交叉壓力本身是外生變項，也就是導致政治不活動的原因。

三、政治社會化與交叉壓力

如果交叉壓力的確存在，那麼交叉壓力從何而來？個體政治社會化過程中，不是會受到家人、朋友或者同儕團體的影響，而變得政治立場一致嗎？為什麼身處每天經歷的社會網絡，會產生與旁人不一致的政治傾向呢？這不是使個體處於恆常的壓力之下嗎？關於

這一連串的質疑，政治社會化的文獻中有許多討論。家庭的確是父母傳遞相近政黨支持或者政治意識形態重要的場域（Jennings and Niemi, 1974; Tedin, 1980），但前提必須是父母彼此間，或者家人間的政治立場都要均質一致；或者小孩對於父母親的政治立場要精準理解（Acock and Bengston, 1980; Percheron and Jennins, 1981; Tedin, 1980; Westholm, 1999）；或者父母親本身對政治要有興趣，並且持續暗示下一代支持特定立場（Jenning, Stoker and Bowers, 2009），否則的話個體受雙親或家人政治社會化的影響，不見得顯著。

再者，家人（含父母）與小孩在成長過程中，有可能同時受到不同居住、工作、人際環境的變遷及影響，因此接收到不同程度甚至不同立場的外來資訊，形塑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場（Jenning, Stoker and Bowers, 2009: 783）。小孩進入求學階段，尤其在大學階段，朋友與同學縱然有不同政治立場，但透過朝夕相處、彼此討論，個體漸漸習慣多元、異質與開放的政治言論環境（陳陸輝與黃信豪，2007: 8）。大學裡的選課與社團活動，同樣也讓大學生接觸各種政治言論。更何況 Beck 與 Sibliger 也發現同儕團體對於個體的政治社會化影響也沒有想像中來得大（也見陳陸輝與黃信豪，2007: 15）。儘管有少數人會以政治傾向做為挑選朋友的依據，但絕大部分的個體覺知到與同學、同儕間的歧異，但仍能和平共存，甚至時間一久還能培養政治寬容的精神（見 Mutz, 2002 的經驗檢證）。

換言之，政治社會化不見得單一方向的造成同化，它有可能在個體不同生命階段的交互影響下，同時培養個體接受多元與歧異的公民性格。個體在家庭階段也許受父母影響形成一種特定政黨立場，受教育之後可能逐漸改變，工作之後也可能「保留」大學時期所形成的改變，不影響人際交往。換句話說，政治社會化所造成個

體政治立場的「變」與「不變」，可能同時存在：「變」是同化效果，「不變」是培養政治寬容的表現。因此即使有政治社會化的影響，與家人、朋友的交叉壓力仍然有可能存在，更不用說關係更為疏遠的同事、鄰居也不必政治立場一致，仍能共事與比鄰而居。

參、肆、伍、陸

儘管避免衝突、交叉壓力，與政治不活動的研究，在國外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然而這些架構是否適用於臺灣？能否為國內政治學界開啟一條類似的研究道路？是本文關注的焦點，國內政治學界運用臺灣本土資料，已經有一些初步發現，張佑宗與趙珮如（2006）區隔「社會脈絡」與「個人政治討論脈絡」，發現個人政治討論網絡，較社會脈絡更能預測投票行為；吳重禮、鄭文智與崔曉倩（2006）針對 2001 年縣市長與立法委員選舉，檢證「交叉網路」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發現身處低度交叉網路的選民，會比身處高度交叉網路的選民，更會參加競選期間之政治活動與參與投票。

林聰吉（2007）研究「政治討論」這個較容易受到交叉壓力影響的政治活動，他發現無配偶者，相較於有配偶者，容易因為政治討論而產生的立場歧異，而對投票卻步；Liu（劉正山，2006）運用 2002 年臺灣民主化調查關於北高市長的選舉資料，研究交叉網路對「投票改變」的影響，他稱交叉網路為人際網絡異質性（the heterogeneity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s），而將「投票改變」定義為「上次與這次所投市長人選不同」與「所投的市長人選政黨背景與自己支持的政黨

不同」，他發現北高兩市選民面臨到人際網絡中，旁人政黨支持與自己不一致的時候，選民容易改變投票行為；接續，Liu（劉正山）與 Chiu（邱師儀）（2011）運用臺灣民主化調查 2006 年的資料，針對政黨背叛與政治棄權再做一次檢證，他們發現交叉網路與政黨背叛的連結具有實證支持，但是交叉網路卻無法預測政治棄權（不投票）。

張佑宗與趙珮如的研究主軸，探討到底是「社會網絡」，還是「個人政治討論網絡」對於臺灣選民的投票行為影響較大？作為國內政治學界有關於交叉壓力與政治參與研究的第一篇，他們的文獻多奠基於傳播學研究（2006：9），並由文獻探討中，延伸出脈絡是強加於個人身上的建構，但網絡是個人主動建構的假設，他們發現家人立場的不同的確造成壓力，使受訪者不去投票，但是與鄰居政治偏好不同則沒有這方面的影響，「這可能是由於在現代社會中大多數人和鄰居較無往來，鄰居的看法與家人相比沒有那麼重要」（2006：22）。

與政治立場不同的朋友以及同事的互動，也有抑制投票的效果，但是仍以家人的交叉壓力影響最大。張佑宗與趙珮如突圍社會心理學與理性抉擇模式所產生的自變項較能詮釋政治參與的優勢，也以社會學變項—個人政治討論網絡與社會網絡—來預測投票參與。結果發現政黨偏好的解釋力還是最強（社會心理學變項），但是「個人政治討論網絡」又優於「社會網絡」來的能夠預測投票棄權，顯見社會學變項仍具詮釋力。值得說明的是，張佑宗與趙珮如（2006：22，見該文表 12）僅用「家人與受訪者的政黨偏好不同程度」來代表個人政治討論網絡，而缺乏朋友、鄰居或者同事的政治討論網絡，似乎不完整，有可能是因為臺灣民主化調查對於這些

政治討論網絡的問題多採跳題處理，因此產生樣本數不足的問題，所以才在模型中只採用互動頻率最高的「家人與受訪者的政黨偏好不同程度」來做測量。

吳重禮等人的研究（2006）與本文題目相近，但是該研究以交叉網絡之社會學變項，做為預測政治不活動的唯一焦點變項，本文則除了該變項之外，還多了一個測量內心避免衝突的社會心理學變項，此外，本文在文獻探討的部分，也多了一個從華人本土心理學「社會和諧觀」切入的文獻探討，吳重禮等人建構有序勝算對數模型（2006: 619），同時控制交叉社會網絡、政黨認同、族群認同、統獨立場、政治功效與政治知識等變項，仍舊發現低度交叉壓力與2001年縣市長暨立委選舉期間從事政治活動的程度；低度交叉壓力與2001年縣市長暨立委選舉投票參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在結論中他們提及：

周遭的環境傳遞給他的是與其想法相左的資訊時，將使自己對於政黨、候選人、政治議題的判斷出現不確定性，導致他減少政治參與的可能性，這樣的心理因素稱之為政治矛盾心理。另一種因素係社會責任感，其使得選民在交叉網絡中，減少政治參與程度；亦即處於交叉網絡之下，個人所面對的問題並非是該支持哪一方，而是面對諸多爭議在支持哪一方都會有人反對之下，為了追求網絡同質的人際和諧，迫使個人拒絕表達自己的意見，因而降低了政治參與的動機（吳重禮等人，2006: 623）。

儘管在此結論中，吳重禮等人提到了避免衝突的心理因素會降低政治參與的程度，但事實上他們只進行了外在環境交叉網絡與政治參與的檢證，模型之中並未包括社會心理學變項，也就是避免衝突的變項，此外，吳重禮等人也未理論化社會和諧詮釋政治不活動的關聯性，本文稍後補充。

林聰吉（2007）接續「社會凝聚」與「結構相等」的研究，前者指人們之間的政治影響力是建立在「親近」、「信任」、「尊重」與「互相關懷」，因此個體不管是對親人或非親人，因為社會凝聚、相濡以沫，彼此之間的政治影響力通常很大；後者則是出現在同一社交場所、居住同一社區、工作於同一機構的人們，彼此之間的政治意見也會趨於一致。林聰吉認為（2007: 4），就算在同一社會結構當中的人，沒有社會凝聚的親近感，政治意見也不易趨於一致，社會凝聚與結構相等互相補充，據此，他發現儘管配偶之間討論政治的頻率，沒有配偶各自與其他首要討論政治對象來的頻繁，但是配偶之間政治意見同意度卻是最高的（比起配偶與各自同事、朋友、鄰居之間的同意度）。他發現配偶之間因政治立場歧異而產生的交叉壓力，會讓配偶放棄投票（幾乎達 $p < .05$ 水準，林聰吉 2007: 15）；無配偶者也容易因為與朋友，鄰居、同事等政治立場歧異而不去投票，但無配偶者卻也同樣因為與朋友，鄰居、同事等政治立場接近而「提早決定投票對象」。

林聰吉的研究顯示，交叉壓力在臺灣的樣本上，似乎對於單獨為之的政治參與種類—投票—仍有抑制的影響，只是對於無配偶者影響來得明顯一些，這點與 Huckfeldt（1979）、Giles 和 Dantico（1982），與 Ulbig 與 Funk（1999: 269）對於只有互動式政治參與才受交叉壓力影響的假設不符，但與 Mutz（2002）發現非互動式的

政治參與如投票，也會受交叉壓力的影響相符。總之，不管國內抑或國外的文獻，在政治不活動與交叉網絡和避免衝突是否產生正相關？是否依據該參與行為是否具人際互動性質而定？所得出結論仍舊分歧，再次說明本文進一步探討的動機。

就臺灣民眾的政治參與現況而言，似乎隨著民主制度（如投票與上街抗議）實行的常態化，而有熱度下降的趨勢。在總統大選方面，根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資料，1996年的大選投票率是76%；2000年是83%；2004年是80%、2008年微幅下降至76%；最近一次2012年的總統大選再降到74.38%，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在立委選舉投票率方面，從1997年之後就跌下70%，投票率都在六成多，2001年還有66.16%，2004年投票率首度跌破六成，2008年的第七屆立委選舉再下探一些，區域暨原住民立委的投票率低至58.5%。令人玩味的是，2012年第八屆立委選舉因為與2012年總統大選合併，都選在2012年1月14日舉辦，因此立委選舉的投票率似乎被一向比較熱門的總統大選拉高至同樣水準：74.47%。整體而言，投票率的下降似乎變成一個趨勢，就2012年來說，至少有25%的選民是不投票的，如果說將來不投票的人口漸多，如同美國冷漠的選民現象一般，則未雨綢繆地探究這群政治冷感的臺灣選民不只在理論上，在實務上都深具參考價值，而本文提出的選民的避免衝突心態，與身處交叉壓力的環境，都有可能導致選民卻步而不去投票，對於臺灣選民投票率下降或有詮釋功效。

肆、華人本土心理學的補充

前面提及 Mutz (2002) 與吳重禮等人 (2006) 以社會心理學—避免衝突—的視角來理解交叉網絡，這與用社會學視角來理解交叉網絡是不同的，因此筆者再從華人社會心理學移植有關於避免衝突的研究，來充實本文架構。

對於避免衝突，或者說追求社會和諧的觀念，在華人心裡學中已有豐碩研究，華人的文化屬於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定義上包含幾個核心元素：「我們意識、集體認同、情緒依賴、群體團結、共享、責任與義務、需要穩定與預定的友誼、群體做決定，以及特殊主義」(Hofstede, 1991；齊力，2003：115-45)，在華人社會中，強調人際和諧與團結，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停 (黃曬莉，2005：533)；華人的集體主義，也可用「社會取向」(Social Orientation) 加以理解 (楊國樞，1993)，華人在個體與個體的情感上，互相依賴並傾向壓抑自我與利益追求，個人在考慮他人感受的前提下，形成「自我的互依觀」(Interdependent View of Self)，相對於西方社會以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為文化核心的「自我的獨立觀」(Independent View of the Self) (Markus & Kitayama, 1991: 568-579)。

也有研究 (Hsu, 1981) 詮釋華人生活方式，明白將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定義為「情境中心」(Situation-Centeredness)，中國人時時刻刻對於與他人互動所產生的環境動態保持敏感，以免吃虧或者方便得利，不管是從社會取向、自我的互依觀、情境中心角度觀之，都可以看出華人是一個「考慮他人」的民族，而「和諧」遂為華人

社會中顧慮他人所表現出最可欲的一種平衡（黃曬莉，2005），而和諧的內涵就是「愛好和好、和睦、安和、崇尚和平、不喜歡抗爭、違逆、對立、競爭、鬥爭」（錢穆，1979；黃曬莉，2005: 529），值得強調的是，集體主義構成元素之多，但其中之一包含「和諧」，這是概念性的定義（黃曬莉，2005；Leung, 1987, 1988；Leung and Lind, 1986；楊中芳，1992）。

為從華人心理學的觀念重新認知一次「和諧元素」與「政治不活動」在理論上的鏈結，筆者引用華人社會「虛性和諧」的分析架構（黃曬莉，2005），假設廣泛的政治參與會破壞一定程度的「虛性和諧」，由於政治參與的場域如街頭抗爭、參加競選造勢晚會、甚至是席宴間的政治討論，常常與不熟悉的人，或者是陌生人進行，因此密集的互動，反而容易破壞華人習慣「和而不同」，或者更精確的說，「和而不接觸」的冷淡平衡，此乃虛性和諧，更詳細來說：

虛性的「疏離式和諧」所揭櫫的是一種表面的和諧，這是在實性投契式和諧已然不可能的情況下，以保持距離的淡然關係維持住一虛假的表面和諧，內心裡則不斷地退卻疏離，以求取一個對自我真誠的空間。通常，當事人面對價值觀不合的人，或賦予負面評價（如不喜歡、不欣賞、不服氣或看不順眼）的人，為了避免衝突，會以保持距離的方式，形式化的禮儀行為維繫一個淡然的和合關係。如果不幸與人發生衝突，疏離則是最佳的關係休止符……」（黃曬莉，2005：549）

因此，華人的社會歧異不但不是重點，更是不可欲的，華人見到了政治場域中的歧異，為了避免明顯的輸贏並保持社會和諧，會

選擇和稀泥（楊國樞，1993），同樣的，政治參與場域充滿太多的對立與直接衝突，不管在口頭上，甚至是肢體上，所謂的「虛性和諧」也許提供一個在面對政治參與時的態度準則：就是疏離。因此和諧觀者會選擇政治不參與，儘管稍早臺灣的文獻探討建議，交叉網絡並不只與互動性質的政治參與（如政治討論）有關聯，也與單獨為之的參與（如投票）有關聯。但從華人心理學「和諧觀」的部分來看，反而投票行為會因不需與他人互動而不易破壞和諧。

另一重點在於人際關係之中與誰互動？一起從事政治活動？是家人、朋友、鄰居還是同事？例如張佑宗與趙珮如（2006）用「家人與受訪者的政黨偏好不同程度」來測量個人政治討論網絡，也許感受到一般情形下，個體與家人互動頻繁，是具預測力的自變項。林聰吉（2007）對於個體與家人互動的部分也多所著墨。現代人生活忙碌，朝夕相處最頻繁的是一星期工作五天的同事，與回家之後的家人（尤其是配偶與小孩），但同事僅是工作上共事的夥伴，反而不若個體與朋友因共同興趣而主動交往。最後，與鄰居之間較農業時代互動淡薄，也是不得不然的趨勢。因此筆者合理預測：與家人、朋友之間因政治立場不一致而產生的交叉壓力，較能詮釋政治不活動，與鄰居、同事之間產生的交叉壓力則不受影響。

從個體觀點而言，比較在乎與家人、朋友，還是同事之間的政治歧異？這在理論上比較難以釐清，屬於經驗上的問題（empirical question），有可能儘管朋友不若家人與同事常見面，但個體比較在乎是否與朋友之間因政治立場不同而產生不愉快，甚至因而放棄原來預計的投票對象？林聰吉（2007）的確發現個體首要討論政治的對象（如朋友），比與個體的配偶，在政治討論的頻率上來得高。

與同事之間可能只是公務互動頻繁，但不見得交心，類似「熟

悉的陌生人」，所以縱然政治立場不同，假設上也只是避免就政治議題交換意見而已，但不會阻礙個體政治參與的意向。另一方面，由於衝突避免的心態上，如文獻探討，可能廣泛性的對各種政治不活動進行預測，因此筆者也做此假設。

伍、政治知識、政治效能、統獨立場、政黨認同與政治參與的關係

除了本文的兩個焦點變項之外，這裡簡述政治興趣、政治效能、統獨立場、政黨認同、教育程度、性別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政治興趣促成政治參與是一個直觀的說法，也就是心理層面的興趣轉化為參與行為，盛治仁（2005）發現政治興趣高的人，會常收看電視 Call-in 節目；林瓊珠發現民眾若對選舉事務有興趣，其政治知識也隨之提升。

國外研究發現，政黨傾向與政治興趣成正比，獨立選民的政治興趣，會比政黨支持者低很多（Conway, 1991），由於政治興趣與各種政治參與種類的關係密切，因此研究常將政治興趣當成廣義政治參與的一種，視其為應變項（例如 Wu, 2003: 758 的作法），然而也有研究交叉壓力與政治參與的學者將其視為控制變項之一（林聰吉，2007），由於政治興趣與政治參與關係密切，因此在後續的模型中控制政治興趣，有助於協助確定交叉壓力、避免衝突與政治不活動之間的切實關聯。

政治效能的定義為「民眾信任與支持政府，並認為自己具有瞭解與影響政治事物的能力」（Campbell, Gurin and Miller, 1954：

187-189，也見黃信豪，2005、2006），政治效能又分為內在效能感與外在效能感，前者指民眾認為自己有能力理解政治事務與政治過程，後者指民眾認為政府對於他們的需求有效反應。國外研究發現政治效能感高者，能夠導致較高程度的政治參與（Baker, 1973；Pollock, 1983；臺灣的例子請見 Wu, 2003）。黃信豪（2005）發現臺灣民眾的內在效能感，是民眾競選活動相當重要的基礎；而臺灣民眾的外在效能感高者，則傾向支持執政黨，大致與國外的研究發現一致，由於本文的應變項為政治參與，因此稍後筆者只控制內在效能感，詮釋政治活動的程度高低。

臺灣特有的統獨議題，已是學界研究民眾投票行為的焦點變項之一（例如陳陸輝，2000；盛杏媛，2002；鄭夙芬，2009）；也具有詮釋民眾參與政治的傾向，吳重禮等人（2006）發現在兩千年之後，由於陳水扁總統與民進黨的執政，鼓舞了支持臺灣獨立，或者傾向支持獨立的民眾去參與政治，對於支持統一者則無此傾向；然而2008年馬英九總統執政之後，是否對支持統一的民眾也具類似激勵參與的效果（由於本文的資料選取是在2008之後）？值得進行觀察。

張傳賢與黃紀（2011）認為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不見得劃上等號，只藉由政黨認同的連結，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才產生間接關係，他們還發現支持獨多於統的民眾，傾向支持綠營；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多於臺灣人的民眾，傾向支持藍營，顯見「政黨認同」詮釋臺灣政治現象的有效性。

張佑宗與趙珮如（2006：20）比較「交叉網絡」與「政黨認同」對於投票與否的影響力，發現後者比前者更穩定預測投票行為；他們發現在2004年立委選舉當中，支持藍營者傾向去投票；支持綠營

者則無此連結。吳重禮等人（2006）則在 2001 年縣市長暨立委選舉資料中，發現支持泛藍與泛綠的選民，都傾向參加競選活動；林聰吉（2007）的研究也有類似發現。因此筆者假設政黨傾向越強，參與政治活動的傾向越強。

性別方面，女性比男性對政治更沒興趣，並且政治參與的程度也較低（Verba, Sidney, Burns, and Scholozman, 1997），因此本文期待男性相較於女性，傾向政治參與。國外的文獻發現，教育程度越高者，越有參與政治的傾向，主因為正規教育潛移默化民眾參與政治的技能（Stone and Schaffner, 1988；Keith et al., 1992；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與國外不同的是，臺灣受高等教育的民眾，反而比較容易遠離政治參與（林聰吉，2007），建議了學歷較高者對政治感到疏離，可能因為這個族群對政府的表現比較難感到滿意（陳世敏，1991；相關論述也見吳重禮等人，2006：615）。總之，這些控制變項雖不是本文的焦點，但都是在研究臺灣政治參與過程中相關變數。

陸、研究假設

基於文獻探討，本文有三項假設：

- 【假設一】人際網絡的交叉壓力，會減低個體參與政治的機率。
- 【假設二】個體心中避免衝突的傾向，會減低個體參與政治的機率。
- 【假設三】與家人、朋友之間因政治立場不同而產生的交叉壓力，比與同事、鄰居之間產生的交叉壓力，更會減低個體參與政治的機率。

原則上，本文的主要論述為「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皆會導致政治不活動（或者說導致政治不參與），儘管本文的假設一與二的用意，也同時辨別出這些假設的關聯性，會不會因為政治參與具有人際互動性質而有所不同。

在交叉壓力的部分，筆者期望見到的差異，主要是展現在「家人、朋友」與「同事、鄰居」之間，細部來說，家人與朋友產生的交叉壓力所導致的政治不參與應該是最明顯的，由於與家人血親的連結，與朋友自發性結交的物以類聚；但與同事、鄰居之間可能只是公務往返，或者比鄰而居，卻不見得交心。因此假設上個體會比較在乎與家人、朋友政治立場不同，而放棄政治參與。但對於個體與鄰居、同事之間的不同，不但少有影響，甚至不排除因為歧異性反而激發個體參與政治的可能。

至於社會心理學面向的避免衝突傾向，Mutz（2002）用「政治兩難」來代表「避免衝突」的概念，發現與「單獨為之」的投票行為呈現反比關係，也就是說，不管政治參與是否在社會互動情形下進行？避免衝突的個體傾向與各式各樣的政治參與呈現反比，因此筆者假設：個體心中的避免衝突傾向，造成廣泛的政治不活動。

質言之，這三組假設涉及到三個重點，第一、除了交叉壓力，還有「避免衝突」這個政治不活動的詮釋項；第二、政治參與種類是否涉及人際互動，會不會造成差別？第三、與誰互動以進行政治參與，會不會造成差別？

柒、資料選取

筆者採用「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獨立樣本）」（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or TEDS）之問卷資料（有效樣本數為1,238份）。而TEDS資料之多，筆者只選取此年度資料，是因為歷屆TEDS多未「同時」列入有關「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的題目；或者是問到討論政治對象的問題，卻沒問到受訪者是否支持不同政黨的問題，因此無法測試與鄰居／朋友／家人／同事支持不同政黨，是否導致不與他們討論政治的關聯性？

同時問到「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的題目，還有2001年立委選舉面訪，該問卷包含「與誰討論政治議題」與「討論政治的對象所支持政黨相同」兩個題組，可以構成交叉壓力測量，另一方面也問到受訪者對於「大家的想法應該一致，不然社會就會不安定」論述的贊成程度，與對於「在一個地方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就會影響到這個地方的安定與和諧」論述的贊成程度，可以作為社會和諧觀的測量，不過這些題組距今已有10年歷史，因此筆者決定採用較近、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資料。

又由於2001年立委選舉面訪有關於避免衝突的題目，與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有關避免衝突的題目測量不同，因此筆者難以進行2001年與2008年的「合併橫斷面資料」分析（pooled cross-sectional analysis）。另外，「2008年總統選舉面訪資料」有問到討論政治對象的問題，也問到有關社會和諧的問題，但卻沒問到受訪者

與政治討論對象政黨支持是否一致的題目，因此無法做到前述，去檢證「政黨支持不同」，是否導致「政治不討論」？比較優劣之後，筆者決定使用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資料。

以下以條列方式說明各變項的操作化過程：

(一) 有關於交叉壓力的測量題組包括：

您與您家人／朋友／鄰居同事支持的政黨是不是相同？

答案有：1.我與他們支持政黨相同

2.我與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

3.他們支持的政黨不相同

4.我並不了解他們支持的政黨

由於第一個選項是均質的政黨支持，編碼為 1；其次為「我與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意指受訪者自己評估與鄰居、朋友、家人或同事等對象的政黨支持不同，程度上又多了一級異質性，因此編碼為 2。最異質性的為「他們支持的政黨不相同」，也就是受訪者不僅與上述這些對象支持政黨不同，甚至這些對象彼此之間的支持對象也不同，編碼為 3。如此的編碼方式與漸層的概念為國內、外研究交叉壓力的學者所用 (i.e. 林聰吉，2007；Mutz, 2002)。最後，由於第四個答案選項「我並不了解他們支持的政黨」提供資訊有限，因此編碼為系統遺失，如此編碼將這個「交叉壓力」安排為順序變項。

(二) 在政治參與變項的部分，全都是針對 2008 年立委選舉來提問，包括：在立委選舉中投票、拉票、延遲決定將「政黨票」投給哪一黨的程度；延遲決定將「區域立委票」投給哪一位候選人的程度。由於這些題目內容較為冗長，為了閱讀簡潔，政治參與的實際問題請參見附錄的表附錄 5。

(三) 此外，常被用來詮釋政治參與的自變項之一為「政治討論」，在稍後的初步檢證當中會先與交叉壓力作交叉分析，在最後階段的分析中則扮演自變項的角色，其題目為：請問您會不會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後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是時常討論（編碼為 3）、有時討論（編碼為 2）、很少討論（編碼為 1）。

(四)、另一焦點變項為「避免衝突」，與屬於外在環境的交叉壓力測量不同，屬內心層面，測量由兩個題目相加而成。第一個題目：當自己的政治立場與其他家人不同時，有人認為：「應該隱藏自己真實態度」；但也有人認為：「應該真實的表達」。請問您比較同意哪一種說法？前者編碼為 1，後者編碼為 0。

第二個題目：由於臺灣競爭激烈，請問您是否會擔心因為表達個人的政治立場，而使自己或家人遭致不必要的困擾？回答非常擔心編碼為 4；有點擔心為 3；不太擔心為 2；一點都不擔心為 1。針對這兩個题目的反應高度相關（相關性=0.22， $p<.001$ ），避免衝突加總後數值界於 1 至 5。第一個測量比較偏向政治立場與家人不同時的避免衝突傾向；但是第二個測量則是從自己或者家人的角度出發，害怕對外表達政治立場而遭遇衝突，屬於「無特定對象」衝突避免的傾向，兩者相加之後應能體現「對內」與「對外」衝突避免的傾向。

(五) 整體而言，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資料，在政治參與的種類上，提供了以下資料：(1) 有沒有在立委選舉中投票與 (2) 拉票？(3) 延遲多久才決定政黨票意向，與 (4) 延遲多久才決定區域立委票的意向？惟筆者如果能測試其他政治參與種類，如「參加競選造勢晚會」，則能更完整，不過由於該年度沒有包括這些種類政治參與問題，因此以這四種為主。然而，檢證這四種政治參與

種類，已足夠判定「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是否對於個人為之（投票類）與互動型態（拉票、政治討論）的政治參與「有差別性」的影響？也就是「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只抑制拉票、政治討論行為，卻不抑制投票類行為⁸。

捌、結果分析

首先我們檢視社會互動性質強的政治活動—討論政治，看看交叉網絡是否對其產生影響？表 1 呈現單因子變數分析（one-way ANOVA），結果顯示「受訪者與他們支持的政黨相同」、「受訪者與他們支持的政黨不相同」與「他們支持的政黨都不相同」，在抑制政治討論的頻率上，展現由弱到強的程度，在與朋友和與鄰居討論政治的頻繁度上有些例外，因為對於這兩種政治討論對象，受訪者感覺到「自己與他們支持的政黨不同」，並沒有比受訪者感覺到「他們支持的政黨都不同」，而來得討論頻率高一些，反而是低一些。

另一方面，與家人和同事的討論政治頻繁度方面，交叉網絡弱到強的順序性則顯現無疑，儘管如此，從雪菲後測可以看出，受訪

⁸ 最後，為預防焦點變項與政治參與之間的虛假關係，在模型中控制了內在效能感，由兩個題目相加。第一、受訪者同意「政治有時太複雜，我們一般民眾實在搞不懂」，與第二、「政府官員不會在乎我們一般民眾的想法」的程度，數值介於 2~10。其他控制變項還有「政治興趣」，也就是詢問「您對政治的事情感不感興趣」的程度。「統獨傾向」以「統一」與「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兩個選項合併為「統一」，與「獨立」與「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兩個選項」兩個選項合併為「獨立」，來與維持現狀作對比。在「政黨認同」方面，以泛藍或者泛綠對比「不屬於任何一邊」；其他還控制教育程度與性別。詳細的變項資訊與編碼方式，請見附錄表格。

者感受到朋友與鄰居與自己支持相同政黨時，會比起受訪者感受到朋友與鄰居支持的政黨都不相同時，來得容易討論政治（皆顯著在 $p < .10$ 的層級），仍舊見到不同交叉壓力程度所產生的不同效應。

表 1 「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政治」與「自己與他們支持的政黨相同與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與家人討論 政治頻繁度 平均數	與朋友討論 政治頻繁度 平均數	與鄰居討論 政治頻繁度 平均數	與同事討論 政治頻繁度 平均數
1.受訪者與他們支持政黨相同	1.70	1.71	1.67	1.89
2.受訪者與他們支持的政黨不相同	1.53	1.55	1.37	1.64
3.他們支持的政黨都不相同	1.46	1.56	1.40	1.47
N	706	552	168	367
Scheffe 多重比較				
	家人方面	差值 顯著程度	朋友方面	差值 顯著程度
	1>2	0.17 $p < .05$	1>2	0.16 $p < .10$
	1>3	0.24 $p < .01$	1>3	0.15 $p < .10$
	鄰居方面	差值 顯著程度	同事方面	差值 顯著程度
	1>2	3.04 $p < .10$	1>2	0.25 $p < .05$
	1>3	0.27 $p < .10$	1>3	0.42 $p < .01$

題目為：請問您會不會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有關候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是時常討論（編碼為3）、有時討論（編碼為2）、還是很少討論（編碼為1）？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

整體而言，表 1 顯示不管對誰，在尚未控制其他變項情形下，交叉壓力程度越大，討論政治頻率越低。值得注意的是，因為政黨支持的不同導致不去討論政治，有可能只是面對歧異的政治言論環境，多談會遭來外在壓力，而不願去談；但不願去談也不見得影響個體仍要挺身投票的決定，與要把票投給誰的決定。換言之，交叉網絡在進一步檢證前，仍有可能導致其他種類的政治參與。值得注意的是，討論政治在表 1 被視為應變項，主要是為了瞭解其受交叉壓力的影響為何？不過文獻習慣上將討論政治視為自變項之一，在最終階段預測如投票、拉票之類的政治參與。

表 2 交叉壓力、避免衝突預測政治參與

自變項/依變項	投票 (立委)		延遲投票 (立委)		延遲投票 (不分區)		拉票 (立委)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交叉壓力								
家人不同政黨支持	-.590	.534	.338	.490	.532	.471	-1.532	.878#
朋友不同政黨支持	-.998	.531#	.030	.481	-.448	.463	-.403	.703
鄰居不同政黨支持	1.011	1.072	-.179	.724	.396	.693	2.148	1.117#
同事不同政黨支持	1.201	.653#	-1.000	.536#	.126	.511	1.460	.778#
衝突避免	.518	.509	-.523	.407	.019	.392	.348	.622
與家人討論政治	.535	.400	-.120	.332	.023	.318	-.088	.503
與朋友討論政治	-.605	.478	-.640	.388#	.764	.371*	.148	.532
與鄰居討論政治	-.163	.936	.990	.668	1.049	.635#	.800	.910
與同事討論政治	.239	.535	-.704	.440	-.028	.423	1.545	.654*

表 2 交叉壓力、避免衝突預測政治參與（續）

自變項/依變項	投票 (立委)		延遲投票 (立委)		延遲投票 (不分區)		拉票 (立委)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與家人討論政治 ×家人不同政黨支持	.031	.251	-.161	.219	-.158	.209	.311	.341
與朋友討論政治 ×朋友不同政黨支持	.276	.228	.284	.182	.299	.175#	.048	.268
與鄰居討論政治 ×鄰居不同政黨支持	.061	.501	-.356	.324	-.305	.309	-.290	.447
與同事討論政治 ×同事不同政黨支持	-.176	.291	.331	.226	.026	.218	-.883	.353*
衝突避免 ×家人不同政黨支持	.166	.133	.026	.123	-.027	.118	.353	.215
衝突避免 ×朋友不同政黨支持	.164	.140	-.063	.126	.040	.122	-.013	.186
衝突避免 ×鄰居不同政黨支持	-.381	.248	.233	.194	-.037	.186	-.542	.286#
衝突避免 ×同事不同政黨支持	-.192	.148	.143	.133	.001	.127	.104	.199
政治興趣	.303	.088**	-.124	.079	-.286	.077**	.483	.137**
內在效能感	.105	.061#	.044	.051	.021	.048	-.020	.082
統獨立場 （參照維持現狀）								
傾向統一	.126	.244	.019	.212	-.075	.027	.184	.341
傾向獨立	.446	.232#	-.628	.215**	-.705	.211**	.619	.353#

表 2 交叉壓力、避免衝突預測政治參與（續）

自變項\依變項	投票 (立委)		延遲投票 (立委)		延遲投票 (不分區)		拉票 (立委)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Std.	Std.
政黨歸屬 (參照不屬於任何一邊)								
泛藍	.770	.220**	-.721	.191**	-1.332	.185**	1.548	.353**
泛綠	.103	.241	-.254	.229	-.852	.221**	1.328	.403**
教育程度 (參照小學及以下)								
國初中	-.202	.367	.143	.294	.130	.286	.625	.496
高中職	-.573	.326#	.256	.257	.280	.251	.581	.445
專科	-.688	.360#	.548	.297#	.510	.286#	-.155	.529
大學以上	-1.28	.327**	.913	.268**	.906	.259**	-.331	.481
男性	-.020	.178	-.176	.163	.084	.158	-.198	.267
常數項	-1.934	2.44	4.969	1.843**	2.849	1.776	-9.993	2.923**
N	847		600		586		843	
Pseudo R ² 或 Adjusted R ²	.097		.106		.194		.210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

說明：#：<0.10 *：<0.05 **：<0.01

表 2 的模型對於交叉壓力與政治參與進行更全面的檢證，焦點變項部分，主要含括四個部分：交叉壓力、避免衝突、交叉壓力×討論政治，與交叉壓力×避免衝突。控制這些交互變項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檢證交叉壓力這個社會學變項，與避免衝突這個社會心理學變項有沒有交互影響政治參與的可能？其次，是考量如果沒有討

論政治的實際行為，也許很難直接見到交叉壓力影響政治參與的效果⁹，因此控制交叉壓力×討論政治。

最後，筆者控制政治參與常見變項，包含政治興趣、內在效能感、統獨立場、政黨認同、教育程度與性別。在討論結果之前，必須先說明的是，由於只有受訪者「有效」回答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政治的頻繁程度為何之後，受訪者才能進階回答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之間有沒有交叉壓力的問題？如果受訪者選擇「從來不與這些對象討論政治」，則這些受訪者就被要求略過交叉壓力的問題而不需回答，因而造成許多遺漏值，這個情況尤其在與鄰居有關的問題上，產生許多遺漏值，有效樣本數為 1,238 份的情形下，與鄰居討論政治的樣本數掉到 282 份，與鄰居支持政黨不一致的樣本更是掉到 168 份；其他像與同事討論政治的樣本數也掉到 528 份，與同事支持政黨的樣本數掉到 368 份，若要以這些樣本進行統計分析，在應變項為投票、延遲投票、拉票和與鄰居討論政治的迴歸模型中，樣本數依序掉到了 64、52、64 與 132 份，對於推估母體恐怕失真。

為此，作者使用多重插補法（imputation）來彌補這個缺憾¹⁰，

⁹ 然而，2008L 實際的題目是先個別問與家人、朋友、鄰居，或同事討論政治的頻率有多頻繁？然後剔除掉從不討論的受訪者，再從時常討論、有時討論，與很少討論的受訪者當中，再續問他們與這些討論對象的政治立場有多不同（交叉壓力變項）？因此光是交叉壓力這個變項，就「可能」已經是政治討論後的結果了，不過為了確認「政治討論」與「交叉壓力」的交互作用，筆者仍在模型中控制此交叉變項。

¹⁰ 如何處理遺漏值的問題，已有豐碩的研究，最新的文獻請見 White, I. R., P. Royston, and A. M. Wood. (2011). "Multiple imputation using chained equations: Issues and guidance for practice." *Statistics in Medicine*, 30: 377-399. 與 Royston, P., J. B. Carlin and I. R. White(2009). "Multiple imputation of missing values: New features for mim." *Stata Journal*, 9: 252-264.

多重插補法的意義不在於找回原先遺漏值，而是希望依照模擬（stimulation）的方式，產生有效的統計估計（Rubin, 1987, 1996），其假設為「遺漏值的產生必須是隨機的」，進一步來說，本文所用資料所含的遺漏值為 Missing At Random 或 MAR，也就是「因受觀察值影響而產生遺漏值，但不因未受觀察值影響而產生遺漏值」的情形；因為有關於交叉壓力題組的遺漏值，由受訪者回答政治討論題組時給予「從不討論政治」答案而來。研究發現（Rubin, 1976），若出現 MAR 的問題時，若使用常見的「成批刪除法」（listwise deletion）來處理遺漏值，會產生嚴重的估計偏差（Rubin, 1987），由於 MAR 中的遺漏值只是因為受訪者失去回答特定問題的機會，因此不含特殊意義，適宜使用多重插補法來模擬原來的資料分布。經過多重插補法，新的模型不但與原先未插補前的模型在統計結果上差異極小，前述的複迴歸模型中的樣本數，也回到了 586 至 847 份之間。

表 2 顯著變項的部分，為方便檢視以粗體字標示。就交叉壓力而言，與家人支持不同政黨，傾向不去拉票；而與朋友支持不同政黨，則傾向不去投票。與交叉壓力會抑制政治參與預期相違背的是，若受訪者與鄰居支持不同政黨，反而刺激受訪者為特定立委候選人拉票（ $p < .10$ ），但仍需配合顯著的交互變項一起考量。而與同事支持不同政黨，則也被刺激去投票（ $p < .10$ ）；也不會延遲把票投給特定立委候選人（ $p < .10$ ）。但在面對同事時，在意見不一致的情形下，反而導致投票類行為（包括不會延遲投票），交叉壓力似乎產生激勵參與的效果。

對鄰居所產生的交叉壓力，則在投票類的參與中沒有任何的影響。整體趨勢暗示在投票行為中，個體比較在乎與朋友間的政治歧異，為了他們放棄投票。但與同事之間的政治歧異反而激起受訪者

的投票行動；也減短受訪者對於決定投給哪位區域立委候選人的時間。假設三提及個體容易因為與家人和朋友的差異而放棄政治參與，但比較不受同事與鄰居的影響，在表 2 當中，大致可以看到這個趨勢的發展。

衝突避免本身則沒有顯著，不過其效果在拉票的部分，要配合與鄰居之間交叉壓力來看（交互變項係數為顯著的-.542）。至於討論政治的部分，與朋友討論政治頻率越高，越不會延遲把票投給屬意候選人的時間（ $p<.10$ ）；與同事討論政治頻率越高，越傾向去拉票（ $p<.05$ ），不過也需要配合交互變項來檢視。與鄰居討論政治，又傾向去延遲投票給不分區候選人的時間（ $p<.10$ ），如此結果有點反直覺（counterintuitive），也許是因為與鄰居討論政治會導致對不分區立委投票的負面情感。與同事討論政治，則又會產生拉票行為（ $p<.05$ ），同樣的，因為其交互變項為顯著的負相關，因此 1.545 的正相關有可能誤導詮釋方向（misleading）。

因此，除了針對不分區立委延遲投票的應變項（與鄰居討論政治為自變項）之外，總的來說，政治討論激發與投票相關之政治參與的行為。綜觀表 2，在交互變項的部分，有最多顯著反應的應變項，屬拉票行為。其他應變項除了針對不分區的延遲投票有一個在.10 層級「與朋友討論政治×與朋友支持不同政黨」的變項顯著之外，皆無顯著。

為檢視表 2 中顯著自變項的實際效應（substantive effect or effect size）有多少？筆者以 Stata12.0 軟體繪製圖 1 至圖 7，顯示「交叉壓力」、「避免衝突」與「之間交乘變項」對於應變項的「邊際效應」（marginal eff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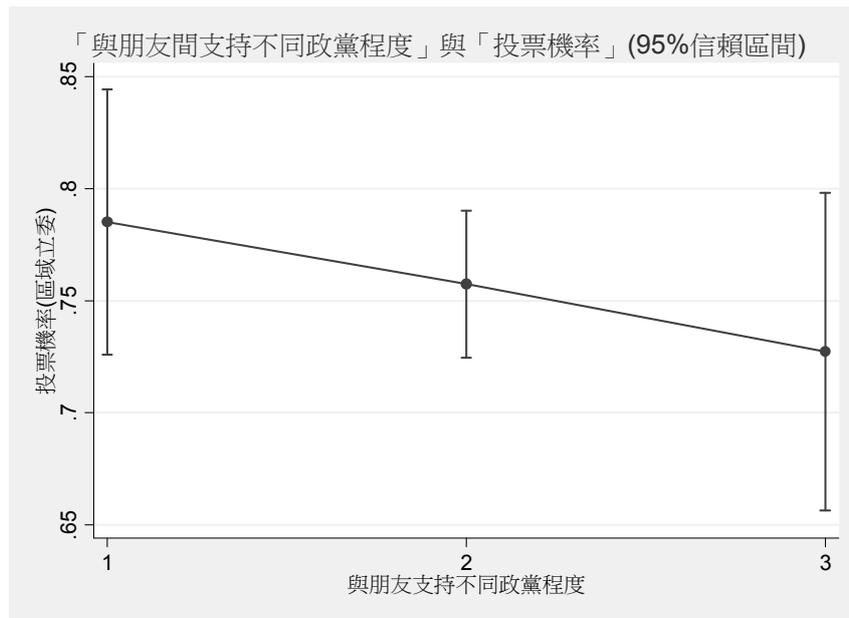


圖 1 「與朋友支持不同政黨程度」X「投票機率」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對應附錄一的表附錄 1-1。

圖 1 顯示從受訪者認為與朋友支持政黨相同（譯碼為 1）到與朋友支持政黨皆不相同（譯碼為 3）對於區域立委投票機率共下降 6%，從 78% 下降到 72%，顯見在朋友間產生交叉壓力對於降低投票機率的效果。圖 2 則剛好相反，從與同事間支持政黨相同，至與同事間支持政黨完全不同，投票機率卻可以增加 15%，與同事產生的交叉壓力反而激起投票決定可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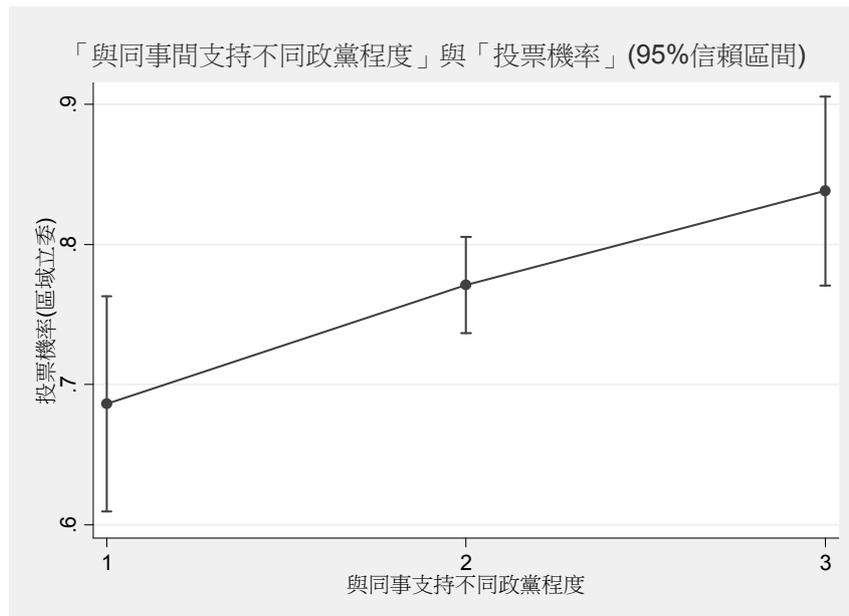


圖 2 「與同事支持不同政黨程度」X「投票機率」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對應附錄一的表附錄 1-1。

圖 3 由於應變項延遲投票（區域立委）介於 1 至 6 之間，因此不以機率概念理解，從與同事低度政治立場歧異至高度政治立場歧異，下降延遲投票程度約 0.19（從 2.89 至 2.70），從「一個月前決定投票人選」往「兩個月前決定投票人選」偏移（詳細題目見附錄表附錄 5）。圖 3 與圖 2 的結果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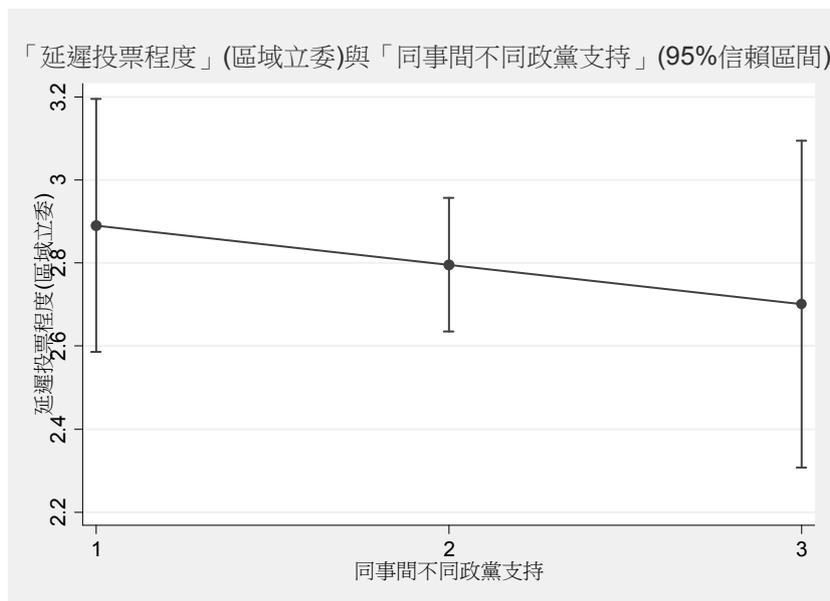


圖 3 「延遲投票程度（區域立委）」X「同事間不同政黨支持」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對應本章的表 3。

表 3 「延遲投票程度」(區域立委)與「同事間不同政黨支持」程度的關係

	邊際效果	Delta-method 標準誤	Z 值	P> Z	95%信賴區間	
at						
1.我與他們支持政黨相同	2.890151	.1553159	18.61	0.000	2.585737	3.194564
2.我與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	2.795697	.0820808	34.06	0.000	2.634821	2.956572
3.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	2.701243	.2006181	13.46	0.000	2.308039	3.094447

圖 4 處理延遲投票〔不分區〕、與朋友政治立場不同，和與朋友討論政治頻率的關係，在表 2 中的方程式表示如下¹¹：

$$\text{①延遲不分區立委投票的時間} = \beta_0 - \beta_1 (\text{與朋友討論政治}) + \beta_2 (\text{與朋友支持政黨不同}) + \beta_3 (\text{與朋友討論政治}) \times (\text{與朋友支持政黨不同}) + \mu$$

在其他自變項控制在平均數的前提下，其中 β_s 為迴歸參數， μ 為殘差值。

¹¹ 為求精簡，本文只羅列表 2 中交互變項有顯著的模型之方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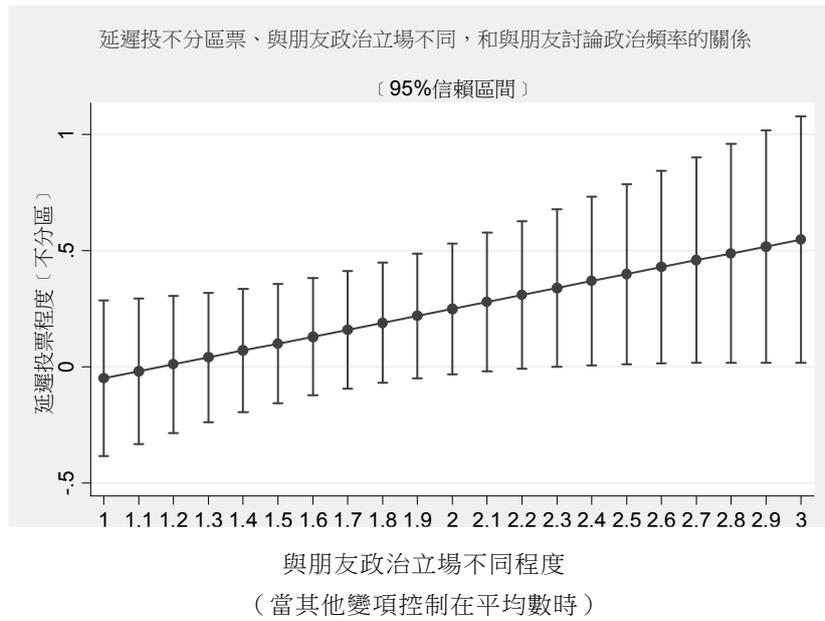


圖 4 「延遲投票程度 (不分區)」 X 「與朋友政治立場不同程度」 X 「與朋友討論政治的頻率」

資料來源：朱雲漢 (2008)，對應本章的表 4。

表 4 「延遲投不分區票」，與「朋友政治立場不同」，和「與朋友討論政治頻率」的關係

	dy/dx	Delta-method 標準誤	Z 值	P> Z	95%信賴區間	
at						
1.我與他們支持 政黨相同	-.0496829	.1711837	-0.29	0.772	-.3851967	.2858309
1.1	-.0197823	.1602029	-0.12	0.902	-.3337741	.2942096
1.2	.0101184	.1504657	0.07	0.946	-.2847889	.3050257
1.3	.040019	.1422277	0.28	0.778	-.2387423	.3187802
1.4	.0699196	.1357622	0.52	0.607	-.1961694	.3360087
1.5	.0998202	.1313312	0.76	0.447	-.1575841	.3572246
1.6	.1297209	.1291442	1.00	0.315	-.1233971	.3828388
1.7	.1596215	.1293152	1.23	0.217	-.0938316	.4130746
1.8	.1895221	.1318349	1.44	0.151	-.0688696	.4479138
1.9	.2194227	.1365736	1.61	0.108	-.0482565	.487102
2.我與他們支持 政黨不相同	.2493234	.1433111	1.74	0.082	-.0315612	.530208
2.1	.279224	.1517816	1.84	0.066	-.0182625	.5767104
2.2	.3091246	.1617129	1.91	0.056	-.0078269	.6260762
2.3	.3390252	.1728535	1.96	0.050	.0002385	.6778119
2.4	.3689259	.184985	1.99	0.046	.0063619	.7314899
2.5	.3988265	.1979253	2.02	0.044	.0109	.786753
2.6	.4287271	.211526	2.03	0.043	.0141438	.8433104
2.7	.4586278	.2256677	2.03	0.042	.0163272	.9009283
2.8	.4885284	.2402549	2.03	0.042	.0176375	.9594192
2.9	.518429	.2552112	2.03	0.042	.0182243	1.018634
3.他們支持政黨 不相同	.5483296	.2704754	2.03	0.043	.0182076	1.078452

圖 4 顯示在其他自變項控制在平均數時，每與朋友政治立場不同增加一個單位時，與朋友討論政治頻率與延遲投票程度之間的關係。由於 β_3 為顯著的.299，因此焦點自變項與應變項的關係，會因為與朋友政治立場不同而有所不同，為求細部變化，將圖 4 中的 X 軸等分為 21 段¹²，介於受訪者與受訪者的朋友之間支持政黨不同（譯碼為 2）與受訪者的朋友彼此之間支持的政黨全不相同（譯碼為 3）之間，與朋友討論政治的頻率每增加一個單位，延遲投票的程度約增加.24 至.54 之間。換言之，隨著與朋友之間交叉壓力的提高，受訪者因為與這些朋友討論政治而導致延後投票的程度漸漸升高。

¹² 若等分為 1、2、3 三段，「延遲投不分區票」和「與朋友政治立場不同」在「與朋友討論政治頻率」顯著的段落上也不會有所改變，只是顯見的資訊比較粗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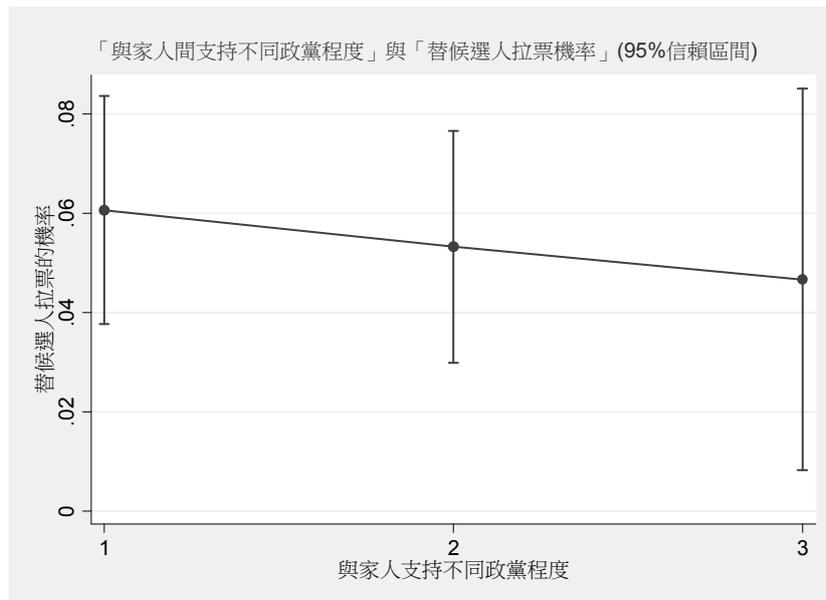


圖 5 「與家人間支持不同政黨程度」X「替候選人拉票機率」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對應本章的表 5。

表 5 「與家人間支持不同政黨程度」與「替候選人拉票機率」的關係

	邊際效果	Delta-method 標準誤	Z 值	P> Z	95%信賴區間	
at						
1.我與他們支持政黨相同	.0606733	.0117088	5.18	0.000	.0377245	.0836221
2.我與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	.0532503	.0119327	4.46	0.000	.0298627	.0766379
3.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	.0466903	.0196407	2.38	0.017	.0081952	.0851853

圖 5 圖示與家人支持不同政黨程度增加，替候選人拉票機率就會降低的關係，從受訪者「與家人支持政黨相同」到「家人支持政黨皆不相同」，共下降了 1.4% 的拉票可能性。與家人政治立場的不同的確使個體避免拉票。圖 6 又涉及到交互變項的關係，方程式如下：

$$\text{②替候選人拉票的機率} = \beta_0 - \beta_1 (\text{與鄰居政治立場不同}) + \beta_2 (\text{衝突避免}) + \beta_3 (\text{與鄰居政治立場不同}) \times (\text{避免衝突}) + \mu$$

在其他自變項控制在平均數的前提下，其中 β_s 為迴歸參數， μ 為殘差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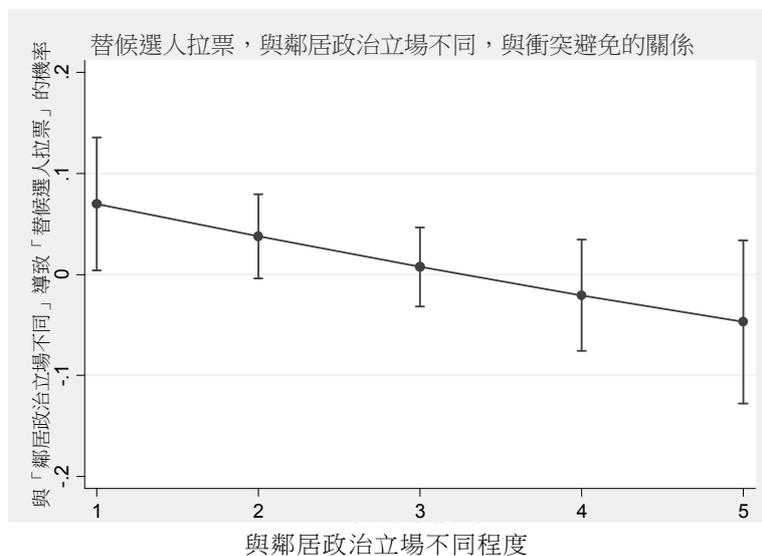


圖 6 「與鄰居政治立場不同程度」 \times 「替候選人拉票機率」 \times 「衝突避免」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對應本章的表 6。

表 6 交叉壓力、避免衝突，與政治參與 OLS 與 2SLS 的比較

自變項\依變項	延遲投票程序				交叉壓力		衝突避免	
	OLS 模型		2SLS 模型		第一階段回歸		第二階段回歸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交叉壓力	.408	.121**	8.055	21.996	-----	-----	-----	-----
衝突避免	.215	.126#	12.178	40.020	-----	-----	-----	-----
政治興趣	-.663	.130**	.830	4.700	-.115	.044**	-.051	.043
內在效能	.070	.086	.431	1.164	-.023	.029	-.015	.028
支持獨立程度	-.728	.246**	.228	2.954	-.045	.085	-.051	.081
支持泛藍程度	-.584	.213**	-----	-----	-.353	.071**	.177	.068**
教育程度	.483	.106**	-.242	2.044	.115	.036**	-.013	.034
男性	.026	.287	-----	-----	.339	.097**	-.215	.093*
常數項	5.259	1.323**	.079	1.906**	6.472	.351**	2.620	.338
N	573		573		573		573	
F 值	10.36		.46		8.98		3.59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

配合圖 6 來考量，只有在與鄰居交叉壓力 1 與 2 程度的時候（低度），避免衝突變項每增加一個單位，替候選人拉票的機率下降 3%。圖 6 是所有圖當中唯一顯現「避免衝突」導致「政治不活動」的效應，儘管這個效應為間接效應。

最後，圖 7 也涉及到交互變項的關係，方程式如下：

③替候選人拉票的機率 $i = \beta_0 - \beta_1$ (與同事政治立場不同) $+ \beta_2$ (與同事討論政治的頻率) $+ \beta_3$ (與同事政治立場不同) \times (與同事討論政治的頻率) $+ \mu$

在其他自變項控制在平均數的前提下，其中 β_s 為迴歸參數， μ 為殘差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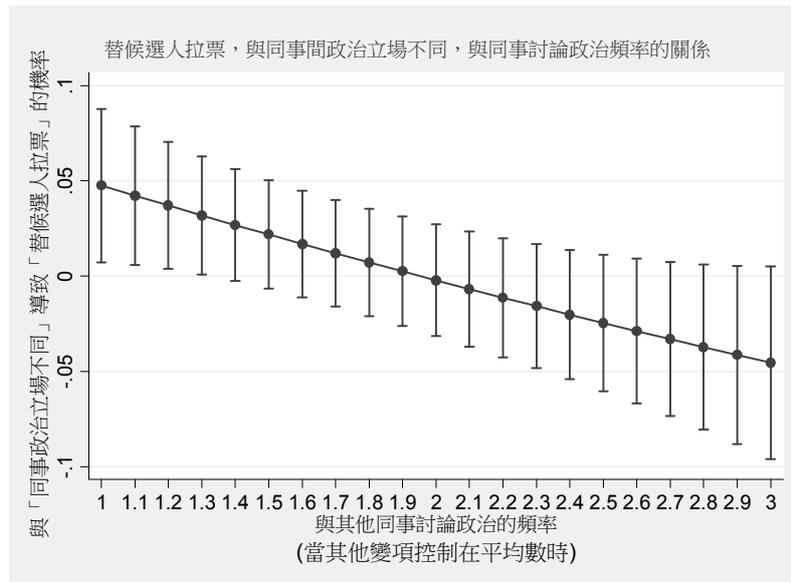


圖 7 「替候選人拉票」 \times 「與同事間政治立場不同」 \times 「與同事討論政治頻率」

資料來源：朱雲漢 (2008)，對應本章的表 7。

表 7 Hausman 測試

自變項\依變項	延遲投票 程序			
	OLS 模型	2SLS 模型		
	係數			
	b(consistent)	B(efficient)	b-B 之差異	sqrt(diag(v_b-v_B)) S.E.
交叉壓力	.408	8.055	7.646	21.995
衝突避免	.215	12.178	11.962	40.019
政治興趣	-0.663	.830	1.493	4.698
內在效能	.070	.431	.360	1.161
支持獨立程度	-.728	.228	.957	2.944
教育程度	.483	-.242	-.725	2.041

b=在 H0 與 Ha 之下都 consistent

B=在 Ha 之下 inconsistent；在 H0 之下 efficient

檢定：H0：兩個模型係數間差異不顯著

$\text{Chi}^2(6) = (b-B)'[v_b - v_B]^{-1}(b-B) = 0.42$

Probability > $\text{Chi}^2 = 0.9987$

圖 7 共有兩個 X 軸區段呈現統計顯著，第一個是從「與同事政治立場不同程度」增加五個單位之前，第二個區段為接近與同事政治立場高度不同的地方（X 軸從 2.8 到 3）。這兩個區段顯見：受訪者與同事政治立場不同在低度與高度程度時，受訪者與同事之間的政治討論，會降低受訪者替喜愛候選人拉票的機率。

至此，總結六項廣泛的統計趨勢：

- 第一、在投票類的參與中，受訪者與朋友產生交叉壓力，傾向棄權投票；又個體與家人間產生交叉壓力，導致個體降低替候選人拉票的機率。顯見個體對於家人、朋友政治意見不同，不但在乎，也產生政治不活動的後果。也就是假設一對於家人、朋友而言是成立的。
- 第二、但若受訪者與同事產生交叉壓力，不但會激發投票慾望，也減短決定投票對象的時間，顯見受訪者在投票過程中，不會順從同事政治意向的心態，這時候交叉壓力反而導致投票，也與 Leighley (1990) 的發現相符合。
- 第三、受訪者與同事和鄰居產生交叉壓力時，反而提高受訪者拉票的機率；但當與同事之間交叉壓力在低度與極高度時，則與同事討論政治越頻繁拉票的機率越低；受訪者與家人之間的交叉壓力則降低拉票的機率。綜合考量第二點，個體與同事與鄰居的政治立場相左，「許多時候」會刺激受訪者去參與政治。
- 第四、進一步分析交互變項：發現在與同事交叉壓力的部分（圖7），交叉壓力越大、討論政治越頻繁，拉票程度越低；在與鄰居交叉壓力的部分（圖6），交叉壓力越大、衝突避免傾向越強烈，則拉票機率越低，顯見「政治討論」與「避免衝突」是交叉壓力抑制拉票行為的「觸媒」。
- 第五、整體而言，避免衝突不是一個詮釋投票參與有效的自變項；但在拉票方面，受訪者與鄰居低度交叉壓力時，受訪者避免衝突的內心傾向越強，其拉票機率越低。質言之，避免衝突僅影響人際互動型的政治參與，但不對投票類的參與做預測。

第六、最後，綜合前面五點，假設三大致是被接受的，儘管仍有一些細部的情形要獨立出來討論。在假設二的部分，只有與鄰居政黨立場不同，配合上避免衝突的概念時，假設二才被接受。總的來說，「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詮釋拉票的能力大於詮釋投票的能力。

至於政治興趣、內在效能感、統獨立場、政黨認同、教育程度與性別等控制變項。

在表 2 當中有政治興趣者，傾向在立委選舉中投票，不會延遲投票時間，並傾向拉票。一如文獻探討，政治興趣是預測力相當一致且有效的自變項。內在效能感除了「投票」之外，皆未達預測效果。與吳重禮等人發現的相同（2006），傾向獨派的民眾在政治參與上，相較於維持現狀的民眾，較容易參與政治，包含較易於投立委票與政黨票，比較容易拉票與傾向不拖延投票時間，與積極拉票；傾向統一的民眾，對比傾向維持現狀的民眾，則無此連結。顯見偏獨派的民眾為選舉候選人時發聲的本質。

一般而言，政黨認同是一個詮釋力強的變項，泛藍者傾向投區域立委票與政黨票；不但不會延遲投票，還會替自己喜愛的候選人拉票；泛綠的支持者，則是不會延遲不分區投票時程，也會幫忙拉票。與「獨比統活躍」認知剛好相反的是，似乎「泛藍選民比泛綠選民還要活躍」，顯見政黨支持與統獨立場，在詮釋政治參與時不必然完全一致的情形。

教育程度在參照小學畢業及以下的對比時，有學歷越高越不願參與政治的情形，擁有高中職及以上學歷者，相較於小學畢業，有不投票的傾向。專科以上學歷者，也傾向延遲投票。可能由於臺灣民主離成熟尚有一段距離，學歷高者的政治品味較高，不易滿足政

治現狀，也不易被政治人物動員而去參與；也可能因為學歷高相對成就高，生活比較忙碌，因此無暇參與政治。最後，臺灣男性並沒有比起女性在政治參與的部分更活躍。表2的四個模型中，依應變項為二元或者區間變項，則顯示 Pseudo R 平方或者是調整後的 R 平方，所有自變項詮釋應變項變量的程度，至低 9.7%，至高有 21%，插補法對模型解釋力的提升，有顯著幫助。

一、交叉壓力、衝突避免與政治參與「內生性問題」的探究

儘管在跨區研究中 (cross-sectional analysis)，自變項與應變項的因果性建立是由文獻探討而來，但是統計技術的進步¹³，允許本文利用 2SLS 初步檢驗交叉壓力、避免衝突是否與政治參與是存在「互為因果」的可能性？從不同角度來說，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是否為政治參與的「外生變項」，能直接影響政治參與？首先，2SLS 的應變項必須是數量變項，為了方便操作，筆者將表 2 中四個應變項中兩個為非類別變項的應變項：「延遲拉票（區域立委）」、「延遲拉票（不分區）」¹⁴合併為一個變項。此外，為模型簡約性 (parsimony)，經過因素分析將與朋友、鄰居與同事三個交叉壓力變項合併為一個「交叉壓力」變項¹⁵，「避免衝突」變項則沿用表 2 原本的變項。

工具變項的選擇由理論引導，從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支持統獨、支持泛藍、教育程度，到男性，都能在理論上找到預測兩個

¹³ Two-Stage Least Squares(2SLS)的統計運用於 1996 年由 Bollen 提出。Bollen, K.A. (1996) "An Alternative Two Stage Least Squares (2SLS) Estimator for Latent Variable Equations." *Psychometrika*, 61: 109-121.

¹⁴ 兩個應變項都各有 1~6 的值，兩者間的信度分析 Alpha 值高達 .80。

¹⁵ 與朋友、鄰居、同事、家人四者的因素分析值分別為 .57、.41、.49、.27。與朋友、鄰居、同事三者的信度分析 Alpha 值為 .53。

內生變項「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的根據，例如政治興趣越高者越勇於在交叉壓力下抒發「異見」(Conway, 1991, 關於黨性與政治興趣關聯性的研究)、政治效能感越高者，其政治態度與政治作為更積極(Almond and Verba, 1963)、統獨藍綠強烈支持者越能面對政治敵對立場(吳重禮等, 2006: 613)、教育程度較高者以自我政治信仰為中心(見陳光輝與蔡奇霖, 2010: 學校教育導致自我政治定位)、男性較女性擅長政治參與中人際互動與溝通的情況(Verba, Sidney, Burns, and Scholozman, 1997)。但這些可能的工具變項中，只有「支持泛藍程度」(相對於中立及支持泛綠)與「男性」，與「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穩定相關在 $p < .05$ 與 $p < .01$ 層級，因此其他可能的工具變項皆不是合格的工具變項來源¹⁶。

又工具變數至少必須與內生自變數一樣多(Bollen, 2001)，因此表6的第一階段迴歸當中「以支持泛藍」與「男性」做為工具變數，越支持泛藍者，越傾向不在交叉壓力環境中，也越傾向避免衝突。男性則相反，男性比女性容易處於交叉壓力中，也越不去避免衝突。第一階段的兩個模型的F值皆未在10以上(Bollen, 1996)，表示儘管「支持泛藍」與「男性」對於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是兩個很好的預測項，但第一階段兩個模型詮釋「被假設」為內生變項的應變項：「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整體模式適配度不是很高。因此到了表6的2SLS模型，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這兩個「內生變項」，甚至失去預測延遲投票程度的能力。對照左邊OLS模型交叉

¹⁶ 先理論納入，後以統計相關性來剔除不適合工具變項的操作，類似研究請見駱明慶(2006)「生育對婦女勞動供給的影響——工具變數法的估計」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臺大經濟系)。

壓力與避免衝突一如預期的表現，2SLS 模型無法與之匹敵。

表 7 中的 Hausman 測試直接比較 OLS 與 2SLS 模型優劣。虛無假設為：兩個模型係數間差異不顯著。儘管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在 2SLS 模型中的係數比在 OLS 模型中大很多，但是由於這兩個變項在 2SLS 模型中並不顯著，因此就算係數大，Hausman 測試也不列入考慮，其結果就是無法拒絕虛無假設 ($p=.9987$)，也就是一致性 (consistent) 的 OLS 模型，優於有效率 (efficient) 的 2SLS 模型。

換言之，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兩個變項並非內生變項，而應該被視為「外生變項」，也就是我們應該排除交叉壓力、避免衝突，與延遲投票程度「互為因果」的可能性。或者說，當個體處於交叉壓力之下，且越避免衝突，其結果個體就越延遲投票。而不是越延遲投票（越不參與政治），越會導致個體與旁人間政治立場有所不同；與個體越覺得應該去避免衝突。表 6 與表 7 複製文獻探討中 Mutz (2002) 對於交叉壓力內生性問題的檢證，只是她的應變項為政治寬容，本文的應變項為政治參與。

二、誰傾向處於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

表 5 為呈現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的描述性部分，到底哪一個地區？什麼教育程度？甚麼性別的受訪者？所承受的交叉壓力較大？與擁有的避免衝突傾向較強？表 8 當中對於顯著差異的值，以粗體字代表。

表 8 各種交叉壓力與地區、性別、教育單因子變數分析 (one-way ANOVA)

	與家人交叉 壓力	與冊友交叉 壓力	與鄰居交叉 壓力	與同事交叉 壓力	避免衝突
北北基	1.439	1.919	1.943	1.824	2.483
桃竹苗	1.434	1.871	1.850	1.796	2.685
中彰投	1.493	2.030	1.972	1.896	2.531
雲嘉南	1.392	1.978	1.908	1.891	2.483
高屏	1.465	1.928	1.927	1.878	2.554
花東	1.377	1.895	1.820	1.721	2.481
樣本數	1236	1236	1236	1236	984
小學及以下	1.473	1.931	1.861	1.813	2.401
國初中	1.522	1.924	1.883	1.838	2.587
高中職	1.403	1.931	1.957	1.859	2.583
專科	1.428	1.964	1.908	1.823	2.689
大學以上	1.430	1.977	1.976	1.891	2.405
樣本數	1218	1218	1218	1218	976
男	1.434	2.021	1.914	1.941	2.408
女	1.452	1.867	1.934	1.761	2.650
樣本數	1238	1238	1238	1238	1238

註：空格內資料為平均數

雪菲後測 (Scheffe post-hoc test)

與家人交叉壓力方面 地區- 無差異 教育程度- 無差異 性別- 無差異	與朋友交叉壓力方面 地區- 無差異 教育程度- 無差異 性別- 男>女
與鄰居交叉壓力方面 地區- 北北基>桃竹苗 ($p<.10$)；中 彰投>桃竹苗 ($p<.05$) 教育程度- 高中職>小學及以下 ($p<.05$)；大學以上> 小學及以下 ($p<.01$)；大學及以上>國初中 ($p<.10$) 性別- 無差異	與同事交叉壓力方面 地區- 無差異 教育程度- 無差異 性別- 男>女
衝突避免傾向方面 地區- 無差異 教育程度- 無差異 性別- 女>男	

資料來源：朱雲漢 (2008)

在單因子變數分析之下，發現各種交叉壓力，除了與鄰居的部分，與各地區之間無關聯性。配合雪菲後測來看，住北北基的受訪者，交叉壓力較桃竹苗的受訪者要大。住中彰投的受訪者，交叉壓力也較桃竹苗的受訪者來得大。也就是說，較為農村型態的花東受訪者，比較不存在與鄰居政治立場不一致的情形。北部人與中部人

相對於桃竹苗受訪者則較有與鄰居政治立場背道而馳的情形，當然這樣的結果仍欠缺全貌，但我們謹慎的推論：中部與北部都市化的結果，相對於桃竹苗，提高了鄰里間政治異質性的程度。

此外，教育程度只有在與鄰居交叉壓力的部分有所差異。大致的趨勢是學歷越高，與鄰居的交叉壓力越大，與家人、朋友、同事之間的交叉壓力則無差異，展現了「教育程度」與「不同地區」，只與鄰居間的交叉壓力產生關聯，也是國內相關研究沒有點出的一塊發現。儘管與鄰居的交叉壓力在本文的檢證中，不會去抑制投票決定，但鄰里之間的政治異質性確因地區及學歷不同而有所不同。最後，男性普遍容易與朋友、同事產生交叉壓力，也比女性來得不避免衝突。就臺灣選民而言，遭遇政治立場上的衝突時，不難想像的是政治場域多由男性發聲與主導。

玖、結論與建議

總的來說，本文對於西方交叉壓力研究的核心辯論：交叉壓力是否只影響互動性質的政治參與（拉票）？就臺灣的個案來說，儘管答案難是黑白分明的是或否，但本文發現交叉壓力相對上能詮釋拉票，多於投票，建議了一個「是」的答案。對於與家人、朋友較為親密的對象產生交叉壓力的話，則個體會因為在乎、顧忌而放棄投票，也會延遲投票時間。個體與同事的不同，反而容易「唱反調」而激勵投票。與鄰居間的不同則不影響投票決定。

本文對交叉壓力的文獻，做了四點補充，第一、以社會心理學的面向來對照交叉壓力，也就是加入了避免衝突的變項，發現避免

衝突只對互動性質的政治參與（拉票）有抑制效果，但對單獨為之的投票行為，無任何影響。第二、檢視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對於各種政治參與的影響，有許多交互影響。第三、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所產生的交叉壓力，對於政治參與各有不同方向的影響。第三、在理論層次上探討交叉壓力從何而來？政治社會化與交叉壓力可能同時存在。最後、為國內第一次使用 2SLS 嘗試處理交叉壓力內生性問題的研究。

民主的基石在於政治參與，同時民主也需要多元，甚至常常併陳許多歧異的言論。文中已顯示人際間的交叉壓力有可能抑制政治參與，進而扼傷參與民主的功能，Mutz（2002）也許會建議先培養民眾習慣多元與歧異的政治寬容氣度，長此以往政治寬容能夠讓選民在嘈雜的政治氛圍下，仍願意參與政治，實踐程序正義。另一方面，教育扮演重要的功能，文中也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者，越有可能培養自我的政治信仰，而不受周遭不同政治立場者的影響。如何運用教育灌輸選民儘管與他人「政治意見不同」仍不放棄參與表達信念的想法？也許是臺灣社會可以努力的方向。

至於本文及相關研究亟待努力之處。第一，鑑於 TEDS 的資料對於「避免衝突」的測量時有時無（TEDS 中常以民眾對多元意見的態度為標題置放這類測量）；或者，有類似測量時，問的方式卻又不一致，因此難以合併資料處理，進而使樣本數變大，既然 TEDS 陸續已有四組避免衝突的問題，筆者淺見以為在總統大選年同時放四個題目，分別為：

1. 「大家的想法應該一致，不然社會就會不安定」的贊成程度。
2. 「在一個地方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就會影響到這個地方的安定與和諧」的贊成程度。

3. 「當自己的政治立場與其他家人不同時，應該隱藏自己真實態度，或者應該真實表達」的衡量判斷。
4. 「由於臺灣政治競爭激烈，是否擔心因表達出個人的政治立場，而使自己或家人遭致不必要困擾」的贊成程度。

同時有這四個測量，可進一步進行因素分析，產生信度更高的衝突避免變項。

第二、本文所運用的資料針對立委選舉，有可能因此導致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未能系統性詮釋政治參與。換言之，立委選舉不如總統大選來得受到矚目，進而影響測試結果，建議將來研究再對總統大選做檢證。第三、由於交叉壓力測量跳題的設計，讓許多從事交叉壓力的研究者，為資料整理後稀少的樣本數所惱。資料插補法雖然是一個合理的推估工具，但如果將跳題的選項拿掉，讓訪員進行面訪時協助受訪者瀏覽相關題目，則樣本數會更多一點；或者配合第一個改進方式，讓大選年問卷也包含一致且完整的題目，則可藉跨年資料的合併來提高樣本數。

第四、在詢問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題目的同時，需加入各式各樣涉及到社會互動型的政治參與的問卷題目，如此對照起個人為之的參與活動（如投票參與）時，比較結果更能完整。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後續研究應儘早採納實驗法，藉以確認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兩變項的確「導致」了政治不活動。

【附錄】

◆表附錄1 「朋友間支持不同政黨程度」與「投票機率」的關係◆

	邊際效果	Delta-method 標準誤	Z 值	P> Z	95%信賴區間	
at						
1.我與他們支持政黨相同	.7851182	.0301826	26.01	0.000	.7259614	.844275
2.我與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	.7573505	.0167834	45.13	0.000	.7244557	.7902453
3.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	.7272412	.0361945	20.09	0.000	.6563013	.7981811

◆表附錄2 「同事間支持不同政黨程度」與「投票機率」的關係◆

	邊際效果	Delta-method 標準誤	Z 值	P> Z	95%信賴區間	
at						
1.我與他們支持政黨相同	.6862175	.0392166	17.50	0.000	.6093544	.7630807
2.我與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	.7709855	.0175381	43.96	0.000	.7366114	.8053596
3.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	.8382513	.0344394	24.34	0.000	.7707513	.9057512

◆表附錄 3 替候選人拉票機率、與鄰居政治立場不同，與避免衝突的關係◆

	邊際效果	Delta-method 標準誤	Z 值	P> Z	95%信賴區間	
at						
1.我與他們支持政黨相同	.0698249	.0335393	2.08	0.037	.004089	.1355608
2.	.0376936	.0213066	1.77	0.077	-.0040666	.0794538
3.我與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	.007557	.0199506	0.38	0.705	-.0315455	.0466595
4.	-.0206673	.0281323	-0.73	0.463	-.0758057	.0344711
5.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	-.0470598	.0411981	-1.14	0.253	-.1278066	.0336869

◆表附錄 4 替候選人拉票機率、與同事政治立場不同，與同事討論
政治頻率的關係◆

	dy/dx	Delta-method 標準誤	Z 值	P> Z	95%信賴區間	
at						
1.我與他們支持 政黨相同	.0475444	.0205348	2.32	0.021	.0072969	.0877919
1.1	.0422679	.0185534	2.28	0.023	.0059039	.0786318
1.2	.0370615	.0169818	2.18	0.029	.0037776	.0703453
1.3	.0319246	.0158051	2.02	0.043	.0009472	.062902
1.4	.0268566	.0149925	1.79	0.073	-.0025281	.0562413
1.5	.0218569	.0144984	1.51	0.132	-.0065594	.0502733
1.6	.0169249	.142677	1.19	0.236	-.0110392	.0448891
1.7	.01206	.0142438	0.85	0.397	-.0158574	.0399775
1.8	.0072617	.0143774	0.51	0.614	-.0209175	.0354408
1.9	.0025292	.014631	0.17	0.863	-.026147	.0312053
2.我與他們支持 政黨不相同	-.002138	.149817	-0.14	0.887	-.0315017	.0272257
2.1	-.0067405	.015421	-0.44	0.662	-.036965	.0234841
2.2	-.0112788	.0159521	-0.71	0.480	-.0425444	.0199868
2.3	-.0157535	.0165885	-0.95	0.342	-.0482665	.0167594
2.4	-.0201653	.0173501	-1.16	0.245	-.0541709	.0138403
2.5	-.0245147	.0182605	-1.34	0.179	-.0603045	.0112752
2.6	-.0288022	.0193439	-1.49	0.136	-.0667155	.009111
2.7	-.0330285	.0206226	-1.60	0.109	-.0734481	.007391
2.8	-.0371941	.0221152	-1.68	0.093	-.0805392	.0061509
2.9	-.0412996	.0238354	-1.73	0.083	-.0880162	.005417
3.他們支持政黨 不相同	-.0453455	.0257921	-1.76	0.079	-.958971	.005206

◆表附錄 5 模型變項之資訊◆

變項	問卷題目	編碼方式	說明
應變項 1： 投票（立委）	在選舉的時候，有很多人去投票，也有很多人因各種原因沒有去投票。請問在這次的立法委員選舉，您有沒有去投票？	1 有 0 沒有	
應變項 2： 延遲投票 （立委）	請問您何時決定投給該候選人？	1 很早以前就決定 2 兩個月以前決定 3 一個月以前決定 4 兩個星期以前決定 5 投票前一兩天決定 6 投票當天決定	
應變項 3： 延遲投票 （不分區）	請問您何時決定投給該政黨？	1 很早以前就決定 2 兩個月以前決定 3 一個月以前決定 4 兩個星期以前決定 5 投票前一兩天決定 6 投票當天決定	
應變項 4： 拉票（立委）	請問您自己有沒有替候選人向家人、親戚、朋友、鄰居、同事拉票？	1 有 0 沒有	
交叉壓力等四個自變項 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不同政黨支持	那您與您的家人／朋友／鄰居／同事支持的政黨是不是相同？	1 我與他們支持政黨相同 2 我與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 3 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	原始問卷中跳題設計導致的遺漏值，採用插補法，因此在 1 至 3 之間產生許多非整數
避免衝突	由兩個題目相加： 1.當自己的政治立場與家人不同時，有人認為：「應該隱藏自己真實的態度」；但也有人認為：「應該真實的表達」。傾向哪種說法？	第一個題目答案： 1 應該隱藏自己的態度 0 應該真實表達	

◆表附錄 5 模型變項之資訊 (續) ◆

變項	問卷題目	編碼方式	說明
避免衝突	1. 由於臺灣政治競爭激烈，請問您是否會擔心因表達出個人的政治立場，而使自己或家人遭致不必要的困擾？	第二個題目答案： 4 非常擔心 3 有點擔心 2 不太擔心 1 一點都不擔心	加總後該變項的數值為 1~5，越大避免衝突的強度越強
討論政治等四個自變項 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政治	請問您會不會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有關候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是時常討論、有時討論，還是很少討論？	3 時常討論 2 有時討論 1 很少討論	原始問卷中跳題設計導致的遺漏值，採用插補法，因此在 1 至 3 之間產生許多非整數
政治興趣	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政治的事情感不感興趣？	5 非常有興趣 4 完全沒興趣 3 幾乎沒興趣 2 不太有興趣 1 有點興趣	
內在效能感	由兩個題目相加 1. 有人說：「政治有時候太複雜了，所以我們一般民眾實在搞不懂」。 2. 有人說：「政府官員不會在乎我們一般民眾的想法」。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既非同意也非不同意 4 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加總後該變項的數值為 2~10，越大內在效能感越強
統獨立場	關於臺灣和大陸的關係，有幾種不同的看法。您比較偏向哪一種？	1 儘快統一 2 儘快獨立 1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 2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 3 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 3 永遠維持現狀	重編碼為類別變項，靠近統一為 1；靠近獨立為 2；維持現狀為 3

◆表附錄 5 模型變項之資訊 (續) ◆

變項	問卷題目	編碼方式	說明
政黨認同	我們社會上經常有人用「泛藍」與「泛綠」來區分選民的政治傾向，請問您覺得自己是屬於泛藍還是泛綠？	1 泛藍 2 泛綠 3 不屬於任何一邊	編碼為類別變項
教育程度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什麼 (您讀到什麼學校)？	1 不識字 1 識字但未入學 1 小學肄業 1 小學畢業 2 國、初中肄業 2 國、初中畢業 3 高中、職肄業 3 高中、職畢業 4 專科肄業 4 專科畢業 4 大學肄業 5 大學畢業 5 研究所	編碼為類別變項
性別		1 男 0 女	編碼為類別變項

資料來源：朱雲漢 (2008)

參考書目

- 王叢桂 (2005)。〈華人價值研究〉，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 (主編)，《華人本土心理學——上》，頁633-64。臺北：遠流出版社。
- 江宜樺 (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臺北：揚智文化。
- 李美枝 (2005)。〈己群己關係與公私概念〉，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 (主編)，《華人本土心理學——上》，頁447-82。臺北：遠流出版社。
- 何振盛、杜嘉芬 (譯)，Denny Roy (原著) (2004)。《臺灣政治史》。臺北：商務印書館。
- 吳乃德 (1992)。〈國家認同與政黨支持：臺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74期，頁33-60。
- 吳重禮、鄭文智、崔曉倩 (2006)。〈交叉網絡與政治參與：2001年縣市長與立法委員選舉的實證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18卷，第4期，頁599-638。
- 林瓊珠 (2005)。〈臺灣民眾的政治知識：1992~2000年的變動〉，《選舉研究》，第12卷，第1期，頁147-171。
- 徐火炎 (1991)。〈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臺灣地區選民對政黨印象、偏好與黨派投票行為之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4卷，第1期，頁1-57。
- 徐火炎 (2006)。〈臺灣的公民權：經驗內涵的初探〉，發表於《公民權：臺灣社會基本調查第八次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

所國際會議廳，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籌備處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

陳世敏（1991）。〈民意調查與臺灣的民主化：以施政滿意度和公眾人物的聲望調查為例〉，《新聞學研究》，第45期，頁101-118。

陳陸輝（2000）。〈臺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第7卷，第2期，頁109-141。

陳陸輝與黃信豪（2007）。〈社會化媒介、在學經驗與臺灣大學生的政治功效益意識與政治參與〉，《東亞研究》，第38卷，第1期，頁2-46。

陳光輝與蔡奇霖（2010）。〈學校教育與政治社會化：教育程度與自我認定的關聯性〉，《臺灣政治學刊》，第14卷，第1期，頁55-103。

盛治仁（2005）。〈電視談話性節目研究——來賓、議題結構及閱聽人特質分析〉，《新聞學研究》，第84期，頁163-203。

張德勝（1989）。《儒家倫理與秩序情結：中國思想的社會學詮釋》。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張傳賢、黃紀（2011）。〈政黨競爭與臺灣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間的聯結〉，《臺灣政治學刊》，第15卷，第1期，頁3-71。

傅恆德（2003）。《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臺北：韋伯文化。

黃曬莉（2005）。〈人際和諧與人際衝突〉，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主編），《華人本土心理學——上》，頁521-66。臺北：遠流出版社。

黃信豪（2006）。〈政治功效意識的行動效果：1998-2003〉，《臺灣民主季刊》，第3卷，第2期，頁119-158。

楊中芳（1992）。〈中國人真的是具有集體主義傾向嗎？試論中國人

- 的價值體系》，《中國人的價值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下冊）。
臺北：漢學研究中心出版。
- 葉明華、楊國樞（1997）。〈中國人的家族主義：概念分析與實徵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83期，頁169-225。
- 楊國樞（1993）。〈中國人的社會取向：社會互動的觀點〉。楊國樞、余安邦（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念及方法篇（一九九二）》。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 楊國樞、葉明華（2005）。〈家族主義與泛家族主義〉，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主編），《華人本土心理學——上》，頁249-292。
臺北：遠流出版社。
- 齊力（2003）。〈個人主義、家族主義與集體主義的三角關係格局〉，《市師社教學報》，第2期，頁115-45。
- 鄭夙芬（2009）。〈族群、認同與總統選舉投票抉擇〉，《選舉研究》，第16卷，第2期，頁23-49。
- 劉義周（1994）。〈臺灣政黨形象的世代差異〉，《選舉研究》，第1卷，第1期，頁53-73。
- 錢穆（1979）。《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臺北：聯經。
-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cock, Alan C., and Vern L. Bengston. 1980. "Socialization and Attribution Processes: Actual Versus Perceived Similarity among Parents and Youth."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2(2): 501-15.
- Agnew, John A. (1994). "The National Versus the Contextual: The

- Controversy over Measuring Electoral Change in Italy Using Goodman Flow-of-Vote Estimates.”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3, No. 3: 245-54.
- Alvarez, R. Michael, and John Brehm (1995). “American Ambivalence Toward Abortion Poli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39: 1055-1082.
- Alvarez, R. Michael, and John Brehm (1997). “Are Americans Ambivalent Towards Racial Poli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41: 345-374.
- Alesina A, La Ferrara E. (2000). “Participation in Heterogeneous Communiti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 115: 847-904.
- Almond, Gabriel, G. Bingham Powell, Jr., Russel J. Dalton, and Kaare Strom (2008). *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 A World View*. 7th ed. New York: Pearson International.
- Banfield, E. C. (1958).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Baker, Kendall L.(1973).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Efficacy, and Socialization in German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6, No. 1: 73-98.
- Boyden T, Carroll JS, Maier RA.(1984). “Similarity and Attraction in Homosexual Males: The Effects of Age and Masculinity-Femininity.” *Sex Roles*, No. 10: 939-948.
- Bellah, Robert, Richard Madsen, William M. Sullivan, Ann Swidler, and Steven M. Tipton (1986). *Habits of the Heart*.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llen, K.A. (1996) "An Alternative Two Stage Least Squares (2SLS) Estimator for Latent Variable Equations." *Psychometrika*, pp. 61, 109-121.
- Bollen, K.A. (2001) "An Alternative Two Stage Least Squares and Latent Variable Models: Simultaneous Estimation and Robustness to Misspecifications." Ch 7, pp. 199-138 in R. Cudeck, S. Du Toit and D. Sorbom (ed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resent and Future: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Karl Joreskog*. Scientific Software International: Lincolnwood.
- Burleson BR, Samter W.(1996). "Similarity in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Young Adults: Foundations of Attraction, Friendship,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Commun. Rep.* , No. 9: 127-139.
- Byrne D. (1997). "An Overview (and Underview) of Research and Theory within the Attrac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No. 14: 417-431.
- Berscheid E, Reis Ht. (1998). "Attraction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In Dt Gilbert, ST Fiske, and G Lindzey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193-281. New York: McGrawHill. 4th ed.
- Beck, Paul A. (2002). "Encouraging Political Defection: The Role of Personal Discussion Networks in Partisan Desertions to the Opposition Party and Perot Votes in 1992." *Political Behavior*, Vol. 24, No. 4: 309-37.
- Barabas, Jason (2004). "How deliberation affects policy opin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687-701.

- Belanger, Paul, and Munroe Eagles (2007). "Partisan Cross-Pressure and Voter Turnout: The Influence of Micro and Macro Environment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850-67.
- Campbell, Angus,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Miller (1954).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 Curry, Richard O. and Lawrence B. Goodheart(1991). *American Chameleon: Individualism in Trans-National Context*. 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onway, M. M. (1991).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 Carmines, Edward G., and Robert Huckfeldt (1996). "Political Behavior: An Overview." In Robert E.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pp. 223-5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sta, DL and Kahn ME. (2003). "Civic Engagement and Community heterogeneity: 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Science*, No. 1: 103-111.
- Campbell DE.(2004). "*What You Do Depends on Where You Are: Community Heterogeneity and Participation*."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 Conover, P. J., and Searing, D. D.(2005). "Studying 'Everyday Political Talk' in the Deliberative System." *Acta Politica*, Vol. 40: 269-83.
- Dryzek, John S.(2006). *Deliberative Global Politic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Giles, Michael W. and Marilyn K. Dantico (1982).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and the Neighborhood Social Context Revisited.”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26: 144-150.
- Gans, Herbert J. (1988). *Middle American Individualism: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Liberal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X.
- Gottfredson, Michael R., and Travis Hirschi (1990).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94).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al Polit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Hovland, Carl I., Irving L. Janis and Harold H. Kelly (1953).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Opinion Chan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immel, 1955; Popkin (1965); Hope, 1975; Horan 1971; Jackson and Curtis 1972; Davis 1982; Knoke 1990; Mutz 2002a; 2002b from Mutz's 2002.
- Huntington, Samuel P. (1965).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Vol. 17, No. 3: 386-430.
- Horan, Patrick M. (1971). “Social Positions and Political Cross-Pressures: A Re-Exami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36: 650-660.
- Huckfeldt, Robert (1979).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Neighborhood Social Contex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23: 579-592.
- Huckfeldt, Robert (1981).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su, F. L. K. 許烺光 (1981). *American and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s*. 3th ed. Honolulu, H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University.
- Hofstede, Geert (1991).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London: McGraw-Hill.
- Hibbing, John and Elizabeth Theiss-Morse(1995). *Congress as Public Enemy: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Coauthor.
- Hood, Steven J. (1998). "The Myth of Asian-Style Democracy." *Asian Survey*, Vol. 38, No. 9: 853-866.
- Hibbing, John R., and Elizabeth Theiss-Morse (2002). *Stealth Democracy: Americans' Beliefs about How Government Should Wor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onald (1985). "Aggregate Stability and Individual-Level Flux in Mass Belief Systems: The Level of Analysis Paradox."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No. 1: 97-116.
- Jennings, M. Kent, and Richard G. Niemi. 1974.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Adolesc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noke, David (1990). *Political Networks: The 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ith, Bruce E., David B. Magleby, Candice J. Nelson, Elizabeth Orr, Mark C. Westlye, and Raymond E. Wolfinger (1992). *The Myth of the Independent Vote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enny, Christopher B. (1992).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ffects from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36: 259-267.
- Kim, Yung-Myung (1997). "Asian-Style Democracy: A Critique from East Asia." *Asian Survey*, Vol. 37, No. 12:1119-1134.
- Lazarsfeld, Paul F.,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1944). From Mutz's paper (2002).
- Lazarsfeld, Paul F.,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1968).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ighley, Han E. (1990).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18, No. 18: 459.
- Leung, Kwok. and Allan Lind E. (1986). "Procedural Justice and Culture: Effects of Culture, Gender, and Investigator Status on Procedural Preferenc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19: 125-136.
- Leighley, Jan E. (1990).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No. 18: 459-475.
- Leung, K. 梁覺 (1987). "Some Determinants of Reactions to Procedural Models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A Cross-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3, No. 5: 898-908.
- Leung, K. 梁覺 (1988). "Some Determinant of Conflict Avoidanc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19: 125-136.

- Lee, Jun-han (2002). "Primary Causes of Asian Democratization: Dispelling Conventional Myths." *Asian Survey*, Vol. 42, No. 6: 821–837.
- Liu, Frank Cheng-shan (2006).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Changes in Electoral Choices: A Study of Taiwan's 2002 Mayoral Elections."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6, No.1: 139-158.
- Liu, Frank Cheng-shan and Albert Shihyi Chiu (2011) "Network Heterogeneity, Partisan Defection, and Voter Turnout: Examine Theory with Empirical Data from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 No. 18.
- Merton, Robert K. (1938).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3: 672-682.
- Mansbridge, Jane (1980). *Beyond Adversary Democracy*. New York: Basic Books.
- Markus, Hazel, and Shinobu Kitayama (1994). "A Collective Fear of the Collective: Implications for Selves and Theories of Selv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20: 568-579.
- Mendelberg, Tali and John Oleske (2000). "Race and Public Deliber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No. 17: 169-191.
- Markus, Gregory B. (2001). "American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In James H. Kuklinski (eds.), *Citizens and Politics: Perspective From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401–31. New York: Cambridge Press University.
- Mutz, Diana C. (2002). "The Consequences of Cross-Cutting Networks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6: 838-855.

- Mutz, Diana C. (2002). "Cross-Cutting Social Networks: Testin Democratic Theory in Practi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6, No. 1: 111-126.
- Noelle-Neumann, E. (1974).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 24: 43-51.
- Noelle-Neumann, E. (1993). *The Spiral of Silence: Public Opinion - Our Social Sk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ol, Ithiel de Sola, Robert P. Abslson and Samuel Popkin (1965). *Candidates, Issues and Strategies*. Cambidge: MIT Press.
- Percheron, Annick, and M. Kent Jennings (1981). "Political Contiuties in French Families: A New Perspective on an Old Controversy." *Comparative Politics* 13(3): 421-36.
- Pollock III, Philip H. (1983). "The Participatory Consequenc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tcal Efficacy: A Research Note."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36, No. 3: 400-409.
- Putnam, Robert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Rosenberg, Morris(1954-55). "Some Determinants o Political Apath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No. 18: 349-366.
- Rosenstone, Steven J., and John Mark Hansen (1993).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 Rubin, Donald B. (1976). "Inference and Missing Data." *Biometrika*, No. 63: 581-592.
- Rubin, Donald B. (1987). *Multiple imputation for Nonresponse in Surveys*. New York: Wiley.

- Rubin, Donald B. (1996). "Multiple imputation after 18+ yea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No. 91: 473-489.
- Rosenberg, Shawn (2007). "Types of Discourse and the Democracy of Deliberation." In Editor (ed.), *Delibe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Can the People Govern?*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Stone, William F., and Paul E. Schaffner (1988).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Sniderman, Paul M. and Simon Jackman (2002). "Democratic Discussion: The Role of Reasons and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in Political Argument," In Gerard Grunber, Nonna Mayer and Paul M. Sniderman (eds.), *Democracy Under Strain*.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 Tedin, Kent L. 1980. "Assessing Peer and Parent Influence on Adolescent Political Attitud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1): 136-54.
- Tocqueville, Alexis De (2000). *Democracy in America*, Abridged, with Introduction. Trans. by Sanford Kessler, and Anno. by Stephen D. Grant.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 Theiss-Morse, Elizabeth and John R. Hibbing (2005). "Citizenship and Civic Engagemen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8: 227-249.
- Thompson, Dennis F. (2008). "Deliberative Democratic Theory and Empirical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1: 497-520.
- Ulbig, Stacy G.aralyn L. Funk (1999). "Conflict Avoidanc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 Verba, Sidney, Kay L. Schlozman, and Henry Brady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and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erba, Sidney, Nancy Bruns, and Kay Lehman Schlozman (1997). "Knowing and Caring about Politics: Gender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9, No.4: 1051-1072.
- Westholm, Anders (1999). "The Perceptual Pathway: Tracing the Mechanism of Political Value Transfer across Gener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20(3):525-52.
- Wu, Chung-Li (2003). "Psycho-Political Correlates of Political Efficacy: The Case of the 1994 New Mayoral Election."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Vol. 33, No. 6: 729-760.
- Zipp, John F. and Joel Smith (1979). "The Structure of Elector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